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論



諸問題

1-024

3

Q

1 9 3 7

志
家

目錄

- 一， 中國共產黨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
 - 二， 鞏固國內和平準備對日抗戰——洛甫
 - 三，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諸問題——凱豐
 - 四， 擁護中國共產黨中央二月十日的通電——亮平
 - 五， 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意義及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宣傳解釋大綱
 - 六， 關於黨中央給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電的（問題與答覆）
 ◁特載▷
 - 七， 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史，毛
-

中國共產黨中央給 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

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諸先生鑒：

西安問題、和平解決、舉國慶幸、從此和平統一團結禦侮之方針、得以實現、實爲國家民族之福。當此日寇猖狂、中華民族之存亡千鈞一髮之際、本黨深望貴黨三中全會、本此方針、將下列各項、定爲國策：

- (一) 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
- (二) 保證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 (三) 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材、共同救國；
- (四) 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
- (五) 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貴黨三中全會、果能毅然決然、確定此國策、則本黨爲表示團結禦侮之誠意、願給貴黨三中全會、以如下之保證：

- (一) 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
- (二) 蘇維埃政府改名爲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爲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
- (三) 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
- (四) 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之共同綱領。

國難日亟、時不我待。本黨爲國忠誠、可共天日！諸先生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熱心爲國、定能允許本黨之請求、使全民族禦侮救亡之統一戰綫、從此實現也。我輩同爲黃帝子孫、同爲中華民族兒女、國難當前、唯有拋棄一切成見、親密合作、共同奔赴中華民族最後解放之偉大前程。謹此電達、佇候明教。并致民族革命的敬禮！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二月十日

鞏固國內和平準備對日抗戰

——洛甫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中國民族的偉大勝利！也是中國共產黨政治路線偉大的勝利、勝利！

西安事變對於中國共產黨、以至對於全國人民都是突然而來的、因爲中國共產黨、對於張楊兩將軍的抗日主張、雖表示同情、然而中國共產黨從未主張用那種軍事陰謀的方法、以達到抗日主張的實現。因爲這種軍事陰謀的方法、並不能產生與張楊兩將軍原來所期望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結果。而事實上這種扣留南京最高軍政長官的辦法、必然會同整個南京與整個中央軍處於敵對的地位、而促使新的內戰的爆發。西安事變後內戰空氣瀰漫的形勢、也完全證明了此種方法所必然要產生的惡果。

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是始終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因爲鐵的事實已經證明內戰與抗日是不能同時存在的、要內戰就不能抗日、要抗日就不能內戰。一切挑撥內戰的行動、不論他的主觀動機如何、然而客觀上都不能不利於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賣國賊。這只要一查西安事變發生後、日本帝國主義

論 抗 日 民 族 統 一 戰 綫 諸 問 題

與中國親日派的歡喜若狂的態度就可以完全明白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發言人與中國親日派當時利用一切造謠挑撥的手段、企圖在中國造成一個新的內戰、好使中國變爲第二個西班牙、好使他們能夠順利的滅亡中國、使中國民族陷于萬劫不復之境。這種：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形勢、沒有像當時表現得那樣明顯的！

在新的內戰的危機前面、中國共產黨中央當時的方針、是堅決爲和平而奮鬥。去年十二月十二日黨中央所發表的通電、即是我們和平方針的公開宣言。雖是在本黨和平調解西安事變的過程中、發生了許多曲折變化、發生了許多嚴重的困難、然而我們還是毫不動搖的堅持自己的和平方針、克服了許多障礙、反對了托洛斯基派及一小部份激烈份子的搗亂與破壞、得到了最後的勝利。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根本粉碎了日寇與中國親日派製造內戰滅亡中國的陰謀、開始了中國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與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新階段、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民族的偉大勝利。中國民族從「九一八」到今天、受盡了日寇的侮辱與侵略、用盡了許多安內攘外的嚴重錯誤、最後走上了對內和平對外抗戰的正確道路。這證明中國民族是偉大的民族、中國民族決不會滅亡、中國民族一定要以獨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國的偉大雄姿、在全世界上站立起來。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在事實上更證明了中國共產黨過去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並不簡單是一個宣傳鼓動的口號、而是實際行動的方針。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中、證明給全中國全世界的人民看、他不是一個逍遙於眼前的局部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的利益、局限於舊恨新仇的執服、而不顧大局的小團體、而是真能真正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利益的偉大政黨。紅軍在統一戰綫地區內的行動、它對於抗日統一戰綫共同綱領的忠實履行、它同羣衆的良好關係、它的嚴明紀律、現在就是最守舊的最頑固的、最「反共」的份子、也不能不表示其驚奇與贊揚了。

中國共產黨對於抗日救國的真誠、在西安事變中、得到了具體的事實表現。這種表現、不能不給全中國人民以極大的影響、不能不使全中國人民對於中國共產黨的了解、發生重大的變化。過去對共產黨有成見的政黨與派別、也由於共產黨的這種表現、而願意消除成見、同共產黨接近起來。他們從他們自己的經驗中開始看到、中國共產黨與在他所領導下的英勇的紅軍、在抗日戰綫上決不是他們的敵人、而應該是他們最可靠的朋友、這就使全國幾個最大政黨聯合抗日的統一戰綫的具體建立也開始成為可能。所以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中國民族的偉大勝利、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政治路綫的偉大勝利。

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共產黨中央即於二月十日提出了給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通電。在那裏共產黨對國民黨所提出的要求與保證、誰都可以看到決不是由於中國共產黨走到了末路窮途而不能不出此下策、却正相反、這些要求與保證、正是共產黨一年以來抗日統一戰綫總方針的發展的必然的結論、也是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從宣傳走向實際建立的重要關鍵。這些要求與保證的具體實現、絕不是表示中國共產黨的沒落、而正是表示中國共產黨一年半以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主張的勝利。這種勝利也即是中國民族的勝利、是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勝利。所以中國共產黨也絕不以此自誇、因

論 抗 日 民 族 統 一 戰 綫 諸 問 題

爲救中國是中國共產黨應盡的責任、也是中國共產黨在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的唯一的基本的任務。

但是中國共產黨認爲今天還僅僅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與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新階段的開始。從這裏到全民族統一戰綫的實際建立與對日抗戰的開始、還需要一個過渡的時期、這個時期的長短、決定於全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以及其他政黨的共同努力、決定於中國抗日力量與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賣國賊間的鬥爭形勢、也決定於國際和平陣綫與侵略陣綫間的相互關係。應該看到在這個過渡時期內、一定會發生各種破壞民族統一戰綫的實際建立與對日抗戰的實現的陰謀詭計、對國共兩黨的合作進行各種挑撥離間的手段、對共產黨造謠污蔑、以轉移「抗日的統一戰綫」爲「防共的統一戰綫」等等、應該估計到在這個過渡時期中可能發生的各種嚴重的困難與各種曲折變幻的形勢。這種預見是合乎目前國內外矛盾發展的趨勢的、因爲我們不能想像這個過渡時期是會那樣一帆風順的。這種預見是必要的、因爲只有這樣、我們才不致在某種新的事變面前手足無措。然而我們應該提出、這種預見絲毫也不足以恐嚇我們、使我們對於全民族統一戰綫的實際建立與對日抗戰的實現失去信心。因爲這一個過渡時期內就包含着一切嚴重困難的克服、與引導中國走向抗戰的堅持不拔的偉大力量。中國共產黨首先是不怕一切這些困難的、是要同一切這些困難奮鬥的、並且預料着對日抗戰的必然實行與必然勝利！

爲促進全民族統一戰綫的實際建立與對日抗戰的實現、今天放在中國共產黨前面的具體任務、即是鞏固目前我們開始取得的國內和平并加速度準備對日抗戰、全中國人民、全中國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各黨各派、亦應該同共產黨一起爲完成這些任務而奮鬥。

中國共產黨過去雖是曾經一再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然而結果總是被逼而不能不進行自衛戰。今天已經開始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新階段、那中國共產黨當然是和平統一的最堅決的擁護者。爲了抗戰、中國國內的和平統一是絕對必要的、在今天、在抗日的號召之下而反對和平統一、主張中國的分裂、那實際上是在保持中國軍閥的割據局面、使全國的大規模抗戰的發動成爲不可能、這種言論與行動必然有利於日寇。中國共產黨公開宣言反對這種言論與行動。它給國民黨三中全會的保證即是擁護中國和平統一的實際模範。但中國共產黨同樣反對利用和平統一的口號、實行內戰的陰謀。這種武力統一的辦法、不但在中國歷史上已證明爲不可能、而且實際上只有替日本滅亡中國當清道夫。二十多年來中國內戰與所造成的慘痛惡果、難道還不夠使我們深省嗎？！

全中國人民沒有像今天這樣的渴望着中國的和平統一！因爲他們已經清楚看到：中國只有抗戰、只有滅亡、而抗戰必須和平統一！所以和平統一與團結禦侮、是二位一體的、是缺一不可的。只有爲了團結禦侮才能求得國內的和平統一、而和平統一、又是團結禦侮的先決條件。今天的國難是中華民族的極大不幸、然而這一國難也給了我們以創造統一的新中國的可能。我們今天就要使這種可能成爲實際。我們千萬不要放鬆了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

爲了鞏固全國已經開始取得的和平統一、我們認爲南京中央政府必須迅速召集普選的國民大會、製定真正民主的憲法、澈底實行民主制度、建立全權的國會、產生有威信的全國人民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所選舉出來的行政機構。我們認爲只有這樣、才能最後根絕歷來中國軍閥割據的局面、而使中國走上現代國家的民主共和國的道路、這也就是團結全國力量進行全國性抗戰的最好的道路。

中國共產黨過去曾經揭穿一面進行內戰、一面準備抗戰的空談及其欺騙的作用、指明實質上是投降日寇的賣國行爲、因爲誰也不能相信、在集中全力進行大規模的內戰中間、有任何抗戰的真正準備的可能。相反的、一切內戰、均使國防力量削弱、（不論從政治方面、經濟方面、軍事方面講、均是如此）同準備抗戰的方針完全相反。但中國共產黨決不反對一切真正的準備。相反的、在今天、當國內和平統一開始實現之後、中國共產黨向南京中央政府及全中國號召、加緊準備抗戰的一切力量、不要浪費一分鐘可寶貴的時間、不要爲日本帝國主義的外交家一些虛偽的和平辭令所蒙蔽、而放鬆自己的準備工作、全中國人民應該認識清楚、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的凶惡敵人。是東方一個強大的國家。對日抗戰、決不能認爲是兒戲的舉動。對日抗戰的目的、是爲了要求得中國對於日本的勝利。但是同時應該看到、敵人決不會給我們多少準備的時間、敵人決不允許我們的真正準備、他要向我們挑撥、他要在我們還沒有準備好的時候擊破我們、敵人要求我們的是繼續投降、而我們要不投降、就必須準備即刻應戰。到了堪察加再談抗戰、那是太晚了的事。所以我們的準備、而決不是馬馬虎虎的慢慢的長期的準備！

我們要準備！我們要各方面的準備！我們要人力、財力、武力各方面的準備。所以切勿把準備限制於軍事上。這種準備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是需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誰都明白、中國的民族抗戰、沒有千千萬萬中國民衆的參加、沒有軍民的親密合作、是無法戰勝這極兇惡的強大的敵人的。因此動員千千萬萬中國人民參加抗戰。是當前的緊急任務。爲達到這一回的我們誠懇的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開放民禁、實施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民主權利、使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參加到抗戰中來、中國共產黨在組織民衆參加抗戰方面、當然擔負着重要的責任。經過西安事變之後、誰都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是忠實於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的、是能夠組織全國民衆參加抗戰的團結的力量、他的公開活動不但不會破壞民族統一戰綫、而且反會使民族統一戰綫大大的鞏固起來、反會保障對日戰爭澈底的勝利。

所以我們說、鞏固國內和平、準備對日抗戰、是全中國人民、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當前的緊急任務。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凱 丰——

自中國共產黨發表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主張後、在全國的同胞們中、紛起議論、總括這些議論、不外譽之者有之、疑之者有之、毀之者亦有之。

譽之者、如黨民國領袖馮玉祥、孫科、宋子文、陳果夫、宋慶齡何香凝諸先生、如抗日領袖、馬相伯、章乃器、沈鈞儒、陶行知、鄒韜奮諸先生、如教育界開明的前進的教授、愛國的學生、軍界領袖、如張學良楊虎城于學忠馬占山諸將軍、如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工人、農民、以及凡屬一切熱烈愛國的人士、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主張、無不深表同情和贊助。

疑之者、則皆以爲共產黨主張、「階級鬥爭」、「工人無祖國」共產黨尚民族統一戰綫、只不過是一種策略、並無誠意；或者則以爲紅軍被圍剿到「日暮窮途」只好作「緩兵之計」凡持這種黨論的人士、皆係忠心救國、只在救國的意見和方法上各有不同、而產生這種疑慮的原因、則不外下列二種：第一、客觀的原因、因爲一九二七年後、共產黨與國民黨處於長期的對立、這種客觀的事實、不能不使各界人士對共產黨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主張發生疑問、因爲這種客觀事實而使各界人士發生疑問、亦近情理、不能厚責。消釋這種疑慮則主要的依靠於今後事實之證明、第二、主觀的原因、則因爲懷這種疑慮的人士、對於共產主義多係道聽途說、而從未究其共產主義的真義、猶如五四運動以後、中國許多人士把共產主義傳說爲「共產公妻」是一樣。

毀之者、則有兩種人、第一種人、因素來的誤會和成見對於共產黨的抗日主張不加深刻的攷察、只知肆意攻擊、然而他本人却不是甘心願意作中國奴、如胡適之先生者流；第二種人則唯是漢奸、親日派和托派不願意中國有真正的抗日、不但對於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就是對於一切的抗日主張均加以攻擊和挑撥、盡其一切挑撥離間的能事和手腕、以達破壞中國國內的團結、統一與和平、而希望中國國內的内訌和内戰、以便賣奸於日本、而取得私人的權勢。

因爲全國人士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議論紛紛、爰其大者給以解釋和答覆。

一、民族統一戰綫的客觀實在性

民族統一戰綫是什麼？據共產黨所發表的綱領就是不分黨派不分階級、共同聯合、抗日救國。要達到共同聯合抗日救國、則以停止一切內戰爲先決條件。因爲中國實際上存在的內戰、主要的是共產黨國民黨間戰爭、現在大家均已明白、相互的雖一方想消滅另一方、事實證明已成爲不可能、如果再把這個戰爭延長下去、不但談不到共同聯合抗日救國、相反的給日本強盜以有機可乘。因此、只要停止一切內戰、才有共同聯合抗日救國的可能。

民族統一戰綫就是包括全民的統一戰綫、雖然漢奸不在這一統一戰綫之內、這是很清楚的。如果「團結禦侮」是要停止一切內戰「共赴國難」是包括全民的聯合、則「團結禦侮共赴國難」與民族統一戰綫並沒有基本的差異。如果在「團結禦侮共赴國難」加一「攘外必先安內」的條件則與民族統一戰綫完全相反。

民族統一戰綫所要求的是「團結、統一、禦侮、救國」。而「團結禦侮共赴國難」所要求的也不外是「團結、統一、禦侮、救國」。中國正是處在一個民族危機的前面、這是全國人民所公認的、所感覺到的。需要一致對外、救亡圖存、這也是全國人民的公意、因此全國人民要求民族統一戰綫以達到禦侮抗敵救亡圖存。因此民族統一戰綫是根據目前的客觀環境與需要而被提出的、民族統一戰綫是有他的客觀實在性：

民族統一戰綫不是共產黨創造的、也不是共產黨發明的因爲他的客觀實在性、却是被共產黨用科學的推理所發現。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有人說民族統一戰綫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恰好是說這種話的人沒有具體分析中國的國情、不懂得中國的國情、民族危機到了如此水深火熱的時候、還說中國人不需民族統一戰綫、這種人確實不懂中國的國情、才會發出如此詭譎的議論。

二，民族統一戰綫與中國統一

有人說中國需要的是「和平統一」而不是民族統一戰綫、我們來看這種論點能有多少的正確性、如果單獨的說中國需要「和平統一」這是正確的、但是還不充分。既說中國需要和平統一、那就是說中國現在不和平不統一、要從不和平統一達到和平統一、單只說需要和平統一、這只是一種希望、但要達到實際的和平統一則必須有具體的方案、民族統一戰綫就是達到實際和平統一的具體方案。如果一方面說需要和平統一、另一方面又拒絕民族統一戰綫、這就是把和平統一抽象化了。

和平統一這一口號包括兩種涵義、即（一）需要和平與統一、而不是內戰與分裂；（二）用和平達到統一、而不是用武力統一。因為誰企圖用武力統一中國、即是使中國分裂、使中國內戰。要做到和平統一的這兩種涵義、只有民族統一戰綫可以完成和平統一。因為民族統一戰綫、即是共同聯合抗日救國。民族統一戰綫就是幫助中國統一、民族統一戰綫使中國統一、只有百利而無一弊。

有人說民族統一戰綫是破壞中央的鞏固和中央的領導、因此他們說：「中國所需要的是鞏固的中央、領導人民抗敵救亡」、這種議論是毫無根據的、因為主張民族統一戰綫的、並不主張推翻中央政府、而要求中央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抗日。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如果這樣、又何會破壞中央的鞏固和中央的領導。恰好民族統一戰綫能夠幫助中央的鞏固、因為民族統一戰綫能使國內和平合作、和平統一。

要和平統一而拒絕民族統一戰綫的人、實際只是把「和平統一」抽象化、把和平統一與民族統一戰綫相對立。只有把和平統一與民族統一戰綫相聯繫、才能使和平統一實現。

三，民族統一戰綫與人民陣綫

中國現實生活中所需要的不是人民陣綫、而是民族統一戰綫（或稱民族陣綫）、因為在中國人民前面在國內所受的威脅是民族危機而不是法西主義的危機、人民陣綫在中國並沒有客觀的實在性、因為中國當前並不是感受國內法西主義的危機；民族統一戰綫則有他的客觀實在性、因為中國當前大禍就是民族危機。

人民陣綫發生於西歐各資本主義的國家、因受着法西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的威脅、愛護和平的人民願意維持現狀的當權者起來反對法西主義和戰爭、就組成人民陣綫、人民陣綫是大多數的人民、反對金融寡頭和政治獨裁。在中國人民陣綫已取得勝利、在西班牙的人民陣綫則又帶有民族的性質、因為西班牙受着德意侵略者的威脅、如果佛郎哥取得政權即是西班牙受德意的宰割。

中國所需要的是比人民陣綫更廣泛的全民的民族統一戰綫、一切不做亡國奴的中國人都括包在內、只有漢奸賣國賊除外、中國所需要的雖然是民族陣綫、但却與人民陣綫有密切的關係、因為人民陣綫是擁護和平反對戰爭的集團、所以中國民族

統一戰綫就能與這個集團合作、並且常要與人民陣線與擁護和平反對戰爭的集團合作。中國的民族陣線不是從人民陣線那裏販運來的、而是從中國的實際生活中產生出來的、是地道的中國貨有些人以爲中國的民族陣綫、是莫斯科製造的、或者以爲是由法國人民陣線那裏援引過來的、這都是一種猜想、而沒有去分析中國的現實環境。

四、中國民族統一戰綫的中心 一環在那裏？

中國存在着兩個大的政黨、即國民黨與共產黨、這兩個政黨不管有政治主張的不同、但都是有羣衆基礎有歷史地位、有革命傳統、而且都是在民族運動中生長起來的。國民黨是一個當權的政黨、雖然在他獲得政權後、所代表的社會基礎發生變動、所採取的政策、對外偏於妥協、對內則重於壓迫、但並沒有完全失去他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作用、擁有全國的政權和巨大的軍隊、總想在妥協的道路上、求中國的獨立自由平等、但事實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在有三百萬工人階級爲基礎而產生的中國共產黨、同時又代表着農民的利益、和全民族的利益、確實獲得全國人民的同情、他想在另一個道路上、即是革命的道路上求中國的獨立自由平等。解放中國的民族危機的責任、確實放在國共兩黨的身上、如果對這種民族危機的前面、還不合作共同救國、確是不能滿足全國人民的願望、古入去「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國共合作是統一戰綫的中心一環。

有人說國民黨（就整個而言）是日本的走狗、這猶如說中國共產黨是蘇聯的走狗、一樣的不合事實；有人說國民黨是漢

論 抗 日 民 族 統 一 戰 綫 諸 問 題

奸、這猶如說中國共產黨是赤色漢奸一樣的不合事實；國民黨雖然對日本有某些退讓和妥協、但他並不願意把中國受日本的奴役；中國共產黨雖然願意獲得蘇聯的同情和援助、但他並沒有意思要把中國歸併於蘇聯。

全國的人民在渴望國共兩黨合作、因為如果不是國共兩黨合作、則中國的民族統一戰綫很難形成。國共兩黨合作的成功即是中國民族統一戰綫成功、即是對日戰爭有把握有保障有勝利的前途。

五，國共重返合作的根据在那裏？

有人說共產黨與國民黨有九年的仇怨、不能再有合作、這當然不能成爲理由。中共與國民黨確實有九年的仇怨、但人們却忘記了、這九年的仇怨是在什麼環境之下發生的、而今天的環境又有什麼變動、當着國民黨叛變革命後投降於帝國主義、殘酷的屠殺共產黨、壓迫工農運動。國民黨在這九年間確是盡了賣國的作用、將東三省割讓、毫無抵抗的失去、所以那時中共堅持反對國民黨的賣國政策、反對蔣介石、這在那種情形之下當然是對的。

如果有人根据過去的這種仇怨、而斷定國共不能重建合作、這當然是唯心的、機械的論斷。因為在今天情形已經變更了、日本的繼續進攻無已、迫得國民黨大部人士、也不能不去考慮他過去所採取的政策、國民黨內有許多開明人士已感覺到須要改變過去的政策、而且全國人民渴望國內和平一致抗日。這種情形的變動就是具備國共重建合作的根据與條件。

因為國共重建合作、政黨的合作的問題、而不是私人的仇怨、或友愛的問題。政黨的合作則建立在政治的問題上。雖然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國共兩黨在政治的信仰上、各不相同、而且可以各人保持各人的政治信仰。但是在不願做亡國奴、不願中國滅亡、這一點上、兩黨確又有相同之處、盡管達到這一點的方法、也還有差異、因為形勢的變動國民黨的政策有開始變動的可能、雖然他的政策的變動在今天還是不明朗的、遲緩的、使人不能滿意的、但是日本的繼續的危害到國共兩黨的要求兩黨須要重新考慮兩黨合作的問題。事實也需要兩黨共同合作才能救國。

有了合作的根據和條件、即是說國共兩黨合作的客觀條件已經存在、已經成熟、只要兩黨以誠相見、化干戈為玉帛、變仇敵為朋友、則兩黨合作就能見諸實現。

因此、中國的民族統一戰綫是根據客觀的環境和實際的可能而提出的、雖然如此、在人民中仍有不少的人對於民族統一戰綫懷疑和駭難。對於這些人的意見、不能不給以解釋和答覆、并希望大家參加討論、以使許多疑難的問題、藉此更加明白、而使統一戰綫則更具體化而見諸實行。

六、答覆駭難者若干問題

答覆「人民陣綫」不適合於中國國情」的駭難者、湘省黨部一月十九日電有如下的論點：

- (一) 人民陣綫之所謂人民、並非全體國民、而是共產黨的左翼份子；
- (二) 中國目前需要一鞏固之中央、領導人民禦侮救國；
- (三) 人民陣綫不適合中國國情、更負不起復興中國之責任也；

這一論點、首先沒有把人民陣綫與民族統一戰綫分別清楚。因為在中國並沒有人主張建立人民陣綫、而是主張民族統一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戰綫。因爲中國國內目前並不感受法西主義的危機、而是民族危機、所以不需要人民陣綫。如果因中國不需要人民陣綫而推論到連民族統一戰綫也不需要、這是大錯而特錯。民族統一戰綫是全民的、不但包括左翼份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只有漢奸除外、民族統一戰綫並不與鞏固之中央、領導人民禦侮救國相違背、因爲民族統一戰綫、並沒有主張要推翻中央、而是使中國更團結、使中央的權力更增大、中國更團結、中央的權利更增大、即是鞏固中央。如果中國不團結、中央的權利不能及全中國、則中央政府始終是國民黨之中央政府、而非全國的、更非全國人民的中央政府。

只有民族統一戰綫能使中國統一、中國團結與中央鞏固。湘省黨部的這種論點、確實沒有把事實弄清楚、否則、就是心懷成見、其意雖欲鞏固中央、其實則使中央不鞏固。

樊仲云先生就是第一個不察事實、把人民陣綫與民族陣綫混淆、亂肆批評、在「文化建設」上大發其議論、大非難中國共產黨主張的人民陣綫、其實中共所主張是比人民陣綫更廣泛的民族陣綫。

繼之又有官場人物、如吳鐵城先生也把人民陣綫與民族陣綫混淆不清、亂肆攻擊。出自吳鐵城先生之口猶無不可、因爲吳鐵城先生親手逮捕上海爲民族統一戰綫而奮鬥之七領袖、他爲着掩飾全國人民對於逮捕上海七領袖的憤怒、不得不製造似是而非之反對「人民陣綫」之論點、而加罪於爲民族陣綫與救亡圖存而奮鬥的領袖和刊物、加以逮捕和封閉。

湘省黨部者國民黨之高級領導機關也。對於這種似是而非之理論、不加以考察、隨聲附和、豈不見笑於國人！

答覆汪精衛先生的駁難

汪精衛先生剛從西歐歸國、遠遊重洋、理應見識遠大、高人一等、尤其親聞親見西歐之人民陣綫。不幸汪先生亦將人民陣綫與民族陣綫混淆不清、據援引所得、「法國只有一個政府……除法國民主政府之外更無所謂蘇維埃政府、法國只有一個軍隊、……除法國國防軍隊之外、更無所謂紅軍、法國人民陣綫總是這樣才能發生才能存在」。依據這種理由來反對民族統一戰綫、也是大錯而特錯。難道汪先生不知道國民黨與紅軍之間已有九年之戰爭、難道汪先生希望與紅軍再有九年之戰爭嗎？如果這樣想、即是中了日本的毒計、而是自絕於國人、因為今日全國人民所要求的是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全民族統一戰綫能使國內戰爭停止者、尙未聞汪先生有何高見。也許因汪先生倉忙歸國、未及拜訪布魯姆內閣、却只便道謁見希特勒。希特勒乃西歐反人民陣綫之最激烈者、如果汪先生步仿希特勒的反對人民陣綫、而歸國後亦反對中國之民族陣綫、其謬也奚甚乎、其不適合中國之國情也又奚甚乎、因為希特勒政府是一個想用戰爭向外侵略的政府、而中國則為一個被侵略的國家、何能援引希特勒之反對人民陣綫用之於中國來反對民族陣綫、而且希特勒所締結的「日德協定」一方面就是對付中國。所以中國萬不能援引希特勒反對人民陣綫而反對民族陣綫、這是非常之明顯的。

至於中國是否因紅軍的存在而不能有民族陣綫、這個問題需要解答。吳鐵城先生更把紅軍的存在看作是：軍閥封建餘孽的割據。這兩個問題解答如下。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第一個問題即紅軍的存在與民族陣綫有無防礙。如解答這一問題、我們還須重述國共兩黨合作的根據、因為中國社會客觀的實在性、存在兩大政黨、都有羣衆的基礎、社會的地位和革命的傳統、而在民族解放的問題上也有共同之點、與共同之利害、這是使兩黨合作的根據和條件、有了這個根據和條件對於有紅軍的合作甚易解決、因為共產黨有紅軍就是要用在民族解放的事業上去。有紅軍的聯合、更使民族統一戰綫的力量增大。紅軍的戰鬥力想汪先生亦略為知道、如果把有戰鬥力的紅軍用在抗日的民族戰綫上去、豈不使日本寒心！國共兩黨合作目的是在反對共同的敵人日本、只要在統一戰綫中能和反對共同敵人的力量、都是於兩黨有利。所以紅軍的存在並不能成為反對民族統一戰綫的理由、這是很明白的。而且在紅軍將領方面早已表明在抗日願意服從統一指揮、在不防礙紅軍獨立系統之下可以改變紅軍的名稱。難道這種宣言汪先生獨未聞之嗎？

第二個問題紅軍的存在是否是「軍閥封建餘孽的割據」為着回答這個問題、不能不說一說「軍閥割據」是什麼？軍閥割據的目的是為着爭地盤爭權利、紅軍的存在並不是為着這個目的、即證之於紅軍內服務的官兵、并沒有一個身擁資產百萬、田連阡陌的、只有艱苦奮鬥為爭中國之獨立、為爭人民之解放、中國何處有這樣一種軍閥。紅軍在何時何地與南京政府爭奪過地盤和權力、全世界全中國所聞者只是南京政府對於紅軍的「圍剿」、紅軍為自衛計、不得不反對圍剿。而在當權者又目共產黨和紅軍為「共匪」、既名之匪、又解釋之為「有智識有主義有組織之匪」、舉天下亦聞有、「海盜土匪」者、以打家劫舍為生涯、從未見他們有何智識主義和組織。既有知識有主

義有組織則不能稱爲匪、而是一個政黨、他的目的不在「打家劫舍」、也不在爭權奪利、而是爲的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這是不能與軍閥割據同日而語的。

因此紅軍的存在不但不防礙統一戰綫、而是使統一戰綫更有力、紅軍的存在不是軍閥的割據、而是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就是要實現中國的解放。

答覆胡適之先生的駁難

胡適先生新近從美國回來、他在「張學良的叛國」論文內發表如下的意見；

「我們要談談最近一年來共產黨高唱的所謂「聯合戰綫」。西安的叛變最明白的告示我們、這個聯合戰綫是絕對不可能的。此次的事變至少證明「這幾點、第一向來把國際主義的共產黨是絕對不能一變就成爲愛國主義者的、他們近來高唱的民族主義戰綫、只是在武裝叛亂失敗時的一種策略。第二、他們談的抗日作戰、只是一種無恥的欺騙、因爲決沒有真正抗日的人們願意劫持危害這種主持國防建設並且正開始抗敵戰爭的最高領袖的。打倒蔣介石而擁戴張學良、這是抗日作戰的方略嗎？第三、他們的行爲沒有蘇聯的同情、也決不能獲得蘇聯的援助、這是最近莫斯科的言論早已明白表示的……」

胡適先生總算在太平洋學會上學得了人民陣綫與民族統一戰綫的區別、這當然是好的。胡適先生確實不懂得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的關係、尤其不明瞭最近國內所發生的事件的內幕。前者、則因爲一個素來非難馬克思主義者、要他深究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的關係、這當然是苛刻的要求；後者、則一個地道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的中國人、對於中國所發生的事件、不明內幕、枉加議論、似應由胡先生負責、也許因胡先生初返祖國、對於國事稍有隔核、這也情有可原、然而以一著名學者、枉發議論、則不免大逆輕率。

胡先生論文是對西安事件而發的、因此對於胡先生關於西安事件的觀察、不能不加以真實的說明。西安事件完全出於張楊二將軍愛國的忠誠、並沒有共產黨的任何煽惑和陰謀、而又與兩廣事件絕然不同、這在張漢卿先生親送蔣先生返京的光明正大的態度中、完全看到、而且在蔣先生的談話中也說過「張楊在西安事件中出於忠心愛國是純潔的」中央政府根據這種實際情況、予張漢卿先生特赦、並以寬大政策處理西安善後。難道這些事實胡先生都能不知道嗎？至於共產黨對西安事件的立場、始終支持和平解決、避免內戰、從中斡旋、不無小補。共產黨在西安事件中始終以全民族利益為利益、不與親日派和漢奸以任何口舌和挑釁、雖然在西安事件中有個別左翼份子、曾有過激言論、但彼等與共產黨既無關係、又非共產黨員、更非共產黨的代表、共產黨曾予以善意之勸導、彼等聽之與否、權在彼等、共產黨也無法過分干涉、總之共產黨在西安事件中所採取的態度、認為西安事件推揚忠誠愛國之義舉、並不預辯其爆發、既已爆發、則用盡一切之努力、站在全民族利益上謀西安事件和平解決、在西安事件中共產黨有何陰謀之可言、有何報復之成見、更何能從西安事件中證明聯合戰綫是絕對不可能？

至於胡適先生所說的「決沒有真正抗日的人們願意劫持危言那主持國防建設並且正開始抗敵戰爭的最高領袖」、這顯係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無的放矢、在西安事件後只有日本強盜一個、極力鼓吹爲共產黨所主動的、難道胡先生願中奸人之計嗎？共產黨在西安事件中從沒有主張「打倒蔣介石而擁戴張學良」共產黨在致國民黨的書中就已改變反蔣的態度而爲聯蔣、以促成國共重返合作。這或者因爲胡先生在這時候已離中國、而對這事實未曾知道。至於張漢卿先生因亡家亡鄉亡父亡國之痛、在抗日問題上、在近年來確有激烈之轉變。古人云：「父仇不共戴天」難道亡父亡國之痛、不知道報仇雪恥者、而能成爲黃帝孔子之後裔乎。共產黨對張漢卿先生表示同情、亦理所當然、俗語云：「同病相憐」我想不但共產黨應同情于張漢卿先生、即全國人民亦應倣效越人之于勾踐、「漢卿！你知父仇尙未報乎！」鼓勵張漢卿先生前進。如果同情張漢卿先生、即是反對蔣介石先生、這種邏輯只在胡適先生的實驗主義哲學中才能找到。

至於蘇聯在西安事件上的態度、那是蘇聯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件上的態度、那是中國共產黨的問題。蘇聯無權命令中國共產黨、猶之中國共產黨無權命令蘇聯是一樣、但在西安事件上、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基本上是相同的、舉其大者、蘇聯不願意有西安事件、猶之中國共產黨不預禱西安事件之暴發是一樣、既已暴發、蘇聯主張和平解決、反對討伐不給日本以挑釁（見蘇聯報紙評德王通電）、中國共產黨則努力從中斡旋、以期迅速和平解決。其中有何基本的差異！這又何能證明「近日莫斯科的言論早已明白表示」！

至於胡先生所說的「向來抱國際主義的共產黨是絕對不能一變成爲愛國主義者」在後面解答「工人無祖國」的疑問時將要詳說。如果沒有別的用意、這主要的是因爲對馬克思主義沒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有研究和不了解所發生的誤會。對於馬克思主義沒有研究、這確不能深責胡先生、但對於中國共產黨過去和現在從來沒有離開救國運動和愛國運動、這種事實胡先生似乎不應忘記和看不到。

至於胡先生所說的「他們近來高唱民族主義戰綫、只是他們在武裝叛亂失敗時的一種策略。」又說道「他們談的抗日作戰、只是一種無恥的欺騙」我想中國內部需要的是團結統一與和平、而不是來清算誰勝誰敗、更不應來賭氣、誰投降誰、因為這只是武士的悶氣和王婆罵街的態度、這並不是政治家的態度、尤非學者的態度、於全民族毫無利益。如果說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只是「一種策略」或「無恥的欺騙」而不是共產黨目前忠心誠意的行動綱領。那麼請胡先生將中國共產黨違背自己抗日主張的行動、在何時何地有出賣違背民族利益的事實、公開的或祕密的、都請胡先生宣佈。共產黨最不怕批評、最能接受別人的批評、只要批評是合乎事實、而且常是自我批評、將自己的錯誤自己揭露、使衆人皆知、這並不是醜事、只證明共產黨是開誠佈公、如果胡先生只是一種武斷的說話、那又有何種用處。

六、答覆疑慮者若干問題

答覆「工人無祖國」的疑慮者

有人說共產黨是主張「工人無祖國」的、胡適先生也說向抱國際主義的共產黨是絕對不能一變就成爲愛國主義者。有些人常根據這種論點來懷疑共產黨的民族統一戰綫是不誠意的、是假的。爲回答這個問題、必需略爲說明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聯系。

想必人人都聽到民族問題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中佔主要的一個部分、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民族問題依據時間空間、依據活的歷史環境中來決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解決民族問題的原則是主張民族自決。

「民族自決權就是：民族可以從心所欲的組織起來。他有權按自主的原則去組織自己的生活。他有權與其他民族結為聯邦的關係、他有權完全分立起來。民族是至尊的、而且一切民族是平權的。」（史大林）

「列寧主義擴大民族自決權的定義、解釋這是殖民地弱小國家被壓迫的民族要求有完全分立的權利、是各民族有獨立國家的存在的權利。」（史大林）

「無產階級必須堅決的積極的幫助殖民地被壓迫國家民族解放運動。」（史大林）

「這種幫助就是主張、擁護並執行「民族分離權」組織獨立國家權的口號。」（史大林）

難道這還不明顯嗎？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民族問題的立場是這樣的清楚、馬克思主義一貫的是贊助革命的民族解放運動、馬克思親自曾主張波蘭的獨立和愛爾蘭的解放。馬克思主張「工人無祖國」的口號、就是用來動員宗主國的工人階級去堅決的積極的幫助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在馬克思認為不但被壓迫民族不能得到自由、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誰能非難這種國際主義誰能說這種主張「工人無祖國」是不對的！

列寧在帝國主義時代、更把這種國際主義發揮光大、正在帝國主義的大戰時候、第二國際間的「馬克思主義者」叛變了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國際主義。第二國際伙們投到「本國的」「自己的」資本家懷裏去、在擁護祖國的口號下去擁護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列寧會起來堅決的反對這種可恥的叛變、反對狹窄的愛國主義、列寧重申「工人無祖國」的國際主義、繼承馬克思的幫助被壓迫民族解放的國際主義、列寧關於民族問題、會有巨大的著作、這難道人們都不知道嗎？

如果依照托洛斯基主義去解決民族問題、在被壓迫民族國家內的托洛斯基主義者、一定要成爲好細、照托氏的理論；

「民族國家消滅的時候已經到了」

「在現今世界關係及集團力量配合的條件下、無論那一個殖民地、無論那一個被壓迫民族、不依靠於某一帝國主義列強、不作帝國主義手裏的工具、便不能進行其解放的戰爭、落後民族的民族戰爭再不能有任何獨立的意義了」

這簡直是對於整個被壓迫民族的侮辱！因此、在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國家內的托洛斯基主義者不能不成爲內奸的集團、中國的托陳之成爲漢奸集團、就是根據他們的「導師」的理論、所以在長城抗戰中、中國的托陳派主張「聯日反蔣」、就是依據托洛斯基的理論、主張把中國作日本的工具。在宗主國帝國主義國家內的托洛斯基派則不能不成爲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則不能不主張、「自己祖國」的殖民地應當依靠于「自己祖國」資本家的、所以在帝國主義國家內的托洛斯基派一定要與侵略者法西斯主義相結合。

馬克思主義對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是辯證法的了解。反對虛偽的國際主義、也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在殖民地和被壓迫的民族國家內成爲爭取民族獨立自由平等的革命行動、列寧說「沒有民族的思想、要從封建制度轉到資本主義是不

可能的。」民族主義在宗主國則成爲侵略的工具。

有些人以爲主張「國際主義」的共產黨不能愛國、這不是辯證法的了解、這只是道聽途說的傳聞。恰好在被壓迫民族國家內的國際主義者更需要主張愛國救國。

誰如果不忠於民族解放的事業、誰就不能澈底的解除其民族的受壓迫、也就不能實現其國際主義的理想、因爲不達到民族的完全獨立與自決、也就沒有世界各民族自由聯合的可能。柏不納、約瑟在「民族主義」的性質及其問題」一文中這樣說：

「欲國際主義的人生觀、要濃厚一點、必須要使愛國愛民族的觀念更推廣起來、超過現在不同的程度、那時候人們便毫不遲疑的會爲國際的利益而鬥爭」。

真正的國際主義與革命的民族主義是互相爲用的、說中國共產黨是國際主義者、便不能愛國、這確是沒有了解國際主義的真義何在。即不就理論方面言、難道中共十五年來所參加的愛國和救國運動人們都不看見嗎？這不是對事實的不了解、便是有意的歪曲事實！

答覆對「階級鬥爭」的疑慮者

有些人說共產黨主張「階級鬥爭」、因此而疑慮到他民族統一戰綫是沒有誠意的、對於懷這種疑慮的人、不能不給以解釋。主張「階級鬥爭」確是共產主義者的政治信仰、因爲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規律、馬克思說；「一切過去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因爲社會顯然分成階級、那就不能避免要發生鬥爭。在很早沒有共產黨前這種鬥爭就存在、如奴隸社會內發生奴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諸問題

隸反對奴主的鬥爭、封建社會內發生農奴反對地主和封建主的鬥爭。如中國歷史上農民戰爭、就是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太平天國是一個農民戰爭、那時何常有共產黨存在！如果社會上一天存在階級那末階級鬥爭是一天不會停止的。

如果照這些疑慮的人的意見、那末國共從來不會有合作、也永遠不會有合作。因為中國社會從來就存在階級、將來一個長時期內還會存在階級。可是、事實却不然、在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一樣的是主張「階級鬥爭」。那時却有過將近九年的合作、何以現在就能懷疑到不能合作呢？這種疑慮、顯然是沒有根據的。

而且政黨的合作不一定是建立在「階級鬥爭」這一點、法國共產黨能與法國各政黨合作就是明顯的事實。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重建合作主要的則是在民族問題上。因為中國的民族危機、要求中國各黨派合作、一致抗日。

民族運動與階級鬥爭是有分別、但同時也是有聯系的、民族解放是被壓迫民族反抗壓迫民族的鬥爭、是對於異族壓迫的反抗。階級鬥爭則為站在同一生產關係上的被剝削階級反抗剝削階級鬥爭。這是他們間的區別。但是被壓迫民族要求得解放、必須是被壓迫民族的大多數起來進行堅決的革命鬥爭、才能推翻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對於被壓迫民族的統治、才能獲得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民族解放運動的力量、必須是被壓迫民族的大多數、而被壓迫民族中的大多數、則是以農民為基本羣衆。如果要求得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基本的農民不起來、這種勝利是不能的、。要使得基本的農民起來積極參加民族運動、則非有對於農民生活的改善不可、則非有對於國內佔大多數的勞動羣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諸問題

衆生活的改善不可、這就是民族解放與階級鬥爭間的聯系。

在世界的歷史上也會有過不少的真正的民族運動、他們的解放運動都是在國內大多數的勞動者參加之下而獲得勝利的、在西歐是與農民的解放同時進行、在美國是與黑奴和農民的解放同時進行的。由此看來、階級鬥爭並不妨礙民族的解放運動、而是使民族解放運動更有力、使勝利更有把握更有保證。

答覆「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疑慮者

有人說共產黨主張「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因此他的民族統一戰線是無誠意的、這也是由於誤解而發生的。

共產主義者確是主張「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社會」、這是根據科學的分析、社會發展的規律、一定要走向共產主義的社會、因此共產主義者的最終目的是共產主義社會。但是中共從來沒有主張今天在中國要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只有叛徒奸細托陳派主張今天中國是社會主義革命。中共十五年的鬥爭歷史、在這十五年中全部的政治路綫是主張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民族解放與剷除封建殘餘、主張建立民主共和國。

至於共產主義社會是一種完滿的社會使人類進於大同、在中國這是將來的事情。

很早科學家就推測幾萬萬年之後、地球將要毀滅、如果有人因此而癡天大哭曰：這怎了得、我們的子孫不將絕滅乎！這是把人憂天之愚！

對於共產黨主張最終的目的是「共產主義社會」、因而癡天大哭曰：不得了、共產黨的民族統一戰線是無誠意、這又何

類杞人憂天之愚哉！

答覆對「一種策略」的疑慮者

因爲上面的許多問題沒有使人弄清楚、因此使人疑慮共產黨的民族統一戰綫只是「一種策略」許多人們又把「策略」這一名詞、加以惡意的解釋、以爲策略只是一種手腕、或是把「策略」解釋爲「利用」。這是因爲人們對於列寧主義的對「策略」的態度沒有了解、甚至有些幼稚的共產黨員、也以爲黨的策略是隨便可以決定的。列寧對於黨的策略給以這樣的定義：

「黨的策略是政黨政治行爲的方向和方法。黨的大會採取策略上的決議、爲的是要適應某種新的責任或某種新的政治情況、俾全黨的政治行爲所準繩」。

列寧的這種意見已經最清楚不過的說明了黨的策略就是黨的行動方向和方法、是使全黨的政治行爲有所準繩。策略何能解釋爲「手腕」和「利用」。

而且目前共產黨所提出的抗日救國和民族統一戰綫、就是目前中共的行動綱領、而且最忠誠的執行這個綱領。

如果有人疑慮中共目前的民族統一戰綫只是一種手腕、那麼請指出中共目前在何時何處對於自己的主張有不忠實執行的地方？如果只是武斷的瀾言、那又有何用處？

七答覆挑釁者若干問題

答覆托陳派的挑釁者

中國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已成爲滋奸的集團。因爲他分裂民族陣綫反對國共合作。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諸問題

托洛斯基主義者有三種醜態：

第一種醜態：對中國共產黨說：你們的「聯合各派聯合一致抗日是出賣革命」、你們主張「抗日而不主張反對一切帝國主義是投降帝國主義。」托陳派對中國共產黨想用這種言詞來挑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中國工人階級想用共產黨放棄階級鬥爭、背叛革命來進行挑撥。

第二種醜態：對國民黨說：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只不過是一種無恥欺騙。

第三種醜態：對日本說：我們「聯日反蔣」我們不主張抗日而主張「反對」一切帝國主義。

托陳派的無恥挑撥、只不過是秉承日本的意志、想達到在中國各方面進行挑撥離間、以達到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的。

答覆爲托陳派幫兇的李廷芳

李廷芳原來是中國取消派托洛斯基主義者、據說最近又轉向某某派的傳說。他在文化建設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中國共產黨與其最近的轉變。」他描寫了中國的唐吉訶特後、作出這樣的結論：

「今日共產黨的一切思想和言論不但不比國民黨左、並且比國民黨還右、爲什麼？因爲國民黨直到現在曾未實現過對國民的預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等——但國民黨却從未正式聲明他們已放棄他們的理想。至於共產黨、他已撕毀了他一切理想和宣傳、它在思想和主張上已完全變爲資產階級之一派、變爲大資產階級之附屬物了」。

論 抗 日 民 族 統 一 戰 線 諸 問 題

共產黨確是沒有托陳派那樣「左」。因他們主張不要抗日而要反對一切帝國主義。日本在中國歷次提出的第一條就是取消抗日運動、托陳派則秉承他的日本主子的意志、在「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烟霧彈之下爲時幫助不少、難怪魯迅先生說：

「因爲你們高超的理論爲日本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印出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爲你們捏一把汗、在大家前面、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論、說日本出錢要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的嗎？」

同時共產黨確實也沒有托陳派那麼「高超」、因爲他們說：「聯合各派一致抗日是出賣革命」、他們不主張中國民族解放而主張中國目前要無產階級革命。這種「高超」的理論正如魯迅先生所說：

「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的高超得多、豈但高超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欽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爲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干淨的地方去」。

李延芳想用共產黨「右轉」、或成「爲資產階級之一部」、或「大資產階級的附屬物」來挑撥中共所堅持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是徒勞無功的。因爲中共是久經鍛鍊的黨、他只依據客觀具體情形提出問題、並不依據敵人對他挑撥或「左」或「右」來提出問題托陳雖說中共右轉然而他們的主子日本却天天在罵中共過左、天天在罵中央赤化、而且爲着中共的赤化、訂立日德防共協定、要求訂立中日防共協定。這是托派與日本間的主客交歡。中共則堅持他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爲中國的民族解放。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諸問題

李建芳像似小醜跳樑。李先生自己覺得雖然我不能把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怎樣辦、我總算把中共罵成了唐吉訶特、總算爲「我的老子」托洛斯基爭了一口氣、這還不是「精神勝利萬歲」、李廷芳是十足的阿Q主義！

一九三七年一二八

擁護中國共產黨中央二月十日的通電

——亮 平——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本年二月十日發出通電給國民黨的三中全會這是一個具有最偉大歷史意義的文件、這是一個劃階段的文件、他將無疑的在全國的政治生活上、在禦侮救亡鬥爭的開展上、起他深刻的重大的作用。

首先應當指出、這一通電決不是偶然奇聞或是晴天霹靂。而是最近一年半以來中國政治形勢的變動以及共產黨策略的發展的必然結果。

什麼是一年半以來中國政治形勢的特徵。第一是：日本的侵略有加無已、亡國危險日益嚴重；第二是：不僅廣大的工農小資產階級及最大部份中產階級參加抗日鬥爭。就是大資產階級也起了決定的分化、一大部份民族資產階級大部份富農一部份小地主、甚至受日本直接威脅的某些大地主（如在東北及華北）也表示願意參加抗日的民族鬥爭。民族解放鬥爭真正是推動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參加、雖然他們參加的方式與程度有所不同。第三、由於各階級參加抗日鬥爭的陣線的擴大、使南京統治內部發生劇烈的分化。在南京內部除代表親日地主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諸問題

買辦的親日派外、更形成了抗日派以及逐漸走上抗日道路的中間派、這中間派是接近民族資產階級的、是南京政府中最是有實力的一部份、沒有他們在抗日鬥爭中的參加、沒有他們所指揮的中央軍的全部或至少大部份的參加、那麼大規模抗日戰爭的發動是極爲困難的。第四、共產黨紅軍的抗日主張與行動、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開展日益起其軸心的堅決的影響。

估計到上述政治的特點、共產黨在一年半以來的全部努力、就是如何去團結中國社會的一切可能參加抗日的力量、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推動南京的左派爭取南京中派及其所指揮的中央軍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以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賣國賊、自前年八月以來、共產黨是始終不懈的倍加努力地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其多年以來的中心內容「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實現而奮鬥。前年八月共產黨中央在致蔣馮閻及各省當局的電報中提議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去年五月間向國民革命軍提議停戰議和一致抗日、至八月間、更在致國民書中指出在全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時、蘇區卽爲其組織部份。在十月間紅軍負責人毛主席更鄭重聲明紅軍停止對國民革命軍的一切攻擊行動、雖然直至西安事變爲止、南京軍隊還是繼續進攻紅軍、可是在紅軍方面是忠實「執行自己的主張的、在西安事變爆發以後、大規模內戰的危險甚爲嚴重、共產黨在屢次通電與一切行動中、堅決主張并實際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使十年以來國民革命軍與紅軍的長期的內戰歸於結束、這是中華民族的第一個最偉大的勝利、這是抗日統一戰線的第一個最偉大成功。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共產黨中央二月十日的通電、正是根據西安事件和平解決後抗日鬥爭的需要及共產黨爭取南京中間派的策略而產生的邏輯的結果。這是爲着在新的抗日形勢下進一步團結民族力量的必要的步驟。這是促成國共重新合作的有力的推動、這是實行「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有效的政策。

問題是很清楚的。如果南京政府與蘇維埃政府還是繼續形成對立、國民革命軍與紅軍還是繼續進行內戰、那麼日本的侵略必然將越來越兇以至使中國完全亡國、這無論對於國民黨或是對於共產黨都是誓死不能允許的。整個的中華民族不中國的同胞、甚至外國的友邦都要求國共成立妥協。重新合作、這是絕對必要的。因爲非停止內戰、非國共合作、就不足以言對日抗戰。這也是完全可能的、因爲在共產黨方面、已經過數次的表示了國共合作的忠心耿耿的誠意、同時在國民黨方面、除抗日派外、就是中間派現在也感覺到繼續對內戰爭對外退讓、對民族壓迫的政策之危險結果、而表示願意討論、並決定新的禦侮救亡的國策、國共的妥協與重新合作、既有客觀的絕對必要、又有主觀的充分條件。

那末或許有人提出來問、爲什麼國共合作現在還沒有建立起來呢？

這上面主要的原因是在於一方面南京政府直到今天還沒有確定與實行新的正確的禦侮救亡的國策來代替舊的錯誤的國策、同時蘇維埃紅軍的行動以及土地革命的政策、不能爲民族資產階級及接近民族資產階級之南京中間派所贊同。引起他們的恐懼、而親日派則利用這點來挑撥離間、以破壞國共合作的建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宜、企圖鼓起內戰的重新發生。

我們爲着禦侮救亡就必須消滅國共合作的這種障礙、杜絕親日派破壞合作的藉口、打擊日本及親日派的挑撥離間的毒計。共產黨中央二月十日的通電、就是掃除國共合作的障礙、促成國共合作的建立之偉大歷史文件。

這一通電所要求的是國共兩黨的相互的妥協。這種妥協、不是共產黨投降國民黨、同樣也不是國民黨投降共產黨。當然、每個妥協、要雙方都有讓步、都能同到好處、不然、（假若雙方不能獲得什麼好處、那麼這種妥協顯然是不可能的、那時就不用着來說他）（見列寧一九一七年著）（論妥協）。打了十年的國共兩黨、如果雙方沒有重大的讓步、那麼妥協當然是不可能的。

共產黨所要求於國民黨的讓步是什麼呢？就是改變過去國民黨的錯誤政策而代之以抗日救國的新政策、過去繼續不斷的進行內戰進攻紅軍、現在要停止一切內戰、使全國力量可以集中起來、去抵禦外侮、過去在國民黨統治之下、言論結社集會都沒有自由、愛國犯滿于獄中、現在要允許這些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過去國民黨一黨專政、其他黨派都遭受鎮壓與禁止、現在要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集中全國人材、來共同救國。過去國民政府對外退讓、使國難日益加深、現在要迅速完成抗戰準備、以便迅速對日抗戰、過去國民政府各種措施、使民生日益惡化、現在要採取辦法、使民生改善起來。這是國民黨的讓步、是共產黨及全國民衆所得到的利益。

同時、在國民黨讓步的條件之下、共產黨所作的讓步是什

麼呢？就是停止沒收地主土地、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改變蘇維埃紅軍名義、受南京中央指導、特區（蘇區改的）內實行普選的澈底民主制度。這幾項是原則的重大的讓步。這一讓步。是地主資產階級所歡迎的、因之、也就是南京政府（特別是南京的中間派）所歡迎的、這是國民黨及地主資產階級所得的利益。

這種雙方各得利益的讓步、是爲了一個目的、就是團結整個中華民族、共禦外侮、以救國家、語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中國國家如果滅亡、那麼中華民族之兒女、也將同歸於盡、爲着救國的利益、共產黨要求國民黨讓步、同時自己毅然決然準備好實行重大的讓步、這祇是表示出中國共產黨爲着國家民族而犧牲的忠心苦志、表示國共合作挽救中華民族的可幸的前途、表示出中國共產黨真是澈底爲着民族解放而奮鬥的領導的革命政黨。

當然這一通電的發表、必然引起漢奸托洛斯基派的無恥的譏諷、同時還可能引起某些不了解的人們的懷疑。對於拿了日本金錢受了日本指示來破壞抗日統一戰綫的漢奸托洛斯基派、我們應當以最無情的鬥爭、揭破他們爲日本作走狗破壞抗日統一戰綫的漢奸面目。消滅他們一切破壞革命的鬼計。可是對於奸惡的懷疑的人們我們就應當最明白的向他們解釋我們的立場、使他們能夠明瞭我們主張的正確。

懷疑的人們、首先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共產黨和國民黨打了十年、現在又重新妥協、這不是違背共產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嗎？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對於這一懷疑、我們鄭重的回答道：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並不是一致反對妥協、馬克思列寧主義僅僅反對那些「不可饒教的叛逆的妥協」反對危害革命階級底機會主義的妥協、見（列寧著左派「幼稚病」）而同時應當贊成并實行對於革命有利益的妥協。列寧指出（恩格斯很對的、在批評巴古寧派的共產主義的宣言時、譏笑他們「毫不妥協」的聲明）原則上反對妥協、不問妥協的性質如何、而一概否認妥協之採用、這完全是兒戲、用不着鄭重視之、一個政治家、如願有利於革命的無產階級就要能夠具體看到那種是不能容許的妥協、那種是必要的對於革命有利益的妥協、列寧鄭重的指出：「真正革命政黨的責任、不在提出不可能的拒絕任何妥協、而在能經過不可避免的各種妥協、盡忠于自己的主張、自己的階級、自己的革命任務」。（見「論妥協」）、列寧並指出：布爾塞維克「不但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前採取縱橫捭闔協商妥協之策略、即在十月革命後也是如此、自然這種策略的採用要在能夠幫助、促進鞏固增強布爾塞維克以減弱孟塞維克」。

現在我們試問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妥協是否有利於革命呢？自然是萬分有利與必須的、因為如果再繼續內戰下去、那麼中國就要趨於亡國、無論共產黨員國民黨員都要做亡國奴。有了這種妥協、共產黨既可以從抗日戰爭中求得民族的獨立解放、又可以在民主自由的條件下組織訓練全國的工農及其他勞動人民。這種妥協是全國人民整個民族所要求的革命的必須的妥協。對於這樣的妥協、除漢奸以外任何中國人都是應當贊成和擁護的。

這次懷疑的人們、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過去九年中共黨與

導工農爲着蘇維埃而奮鬥、而流血、這種流血奮鬥現在看來不是錯誤了嗎、落空了嗎？

我們清楚的回答道：過去九年多共產黨爲着蘇維埃紅軍的英勇的流血奮鬥、是完全正確的應該的、而更是有最大效果的、絕對不是落空的。過去九年中的國內及國際的政治環境、要求我們執行這一路綫、而且在那時環境之下、我們也只能執行這一路綫、同時我們更應當說、假使沒有過這九年多共產黨爲着蘇維埃紅軍的英勇奮鬥、那麼也就不能有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開展。因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主張、是共產黨所首倡而爲全國人民及愛國將士所擁護的、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綫運動開展的過程中、蘇維埃紅軍的偉大的力量的推動、是有更重大的作用的、假使沒有蘇維埃紅軍、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也就失去了最堅強的推進的力量。也就不會有目前那樣的发展。蘇維埃紅軍是抗日統一戰綫裏面的最英勇堅決的力量。沒有這一力量、我們也就不能强有力的來拉動南京左派爭取南京中派到抗日戰綫上來。所以我們紅軍渡金沙江、過大渡河、翻雪山走草地的無數的英勇成績以及全國蘇維埃運動中無數烈士所流的鮮血、絕不是落空的白流的。他們的戰績與鮮血滴成了光輝的紅軍。練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中的一支最堅有力的生力軍、這支生力軍推動了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綫、他不僅在抗日戰爭中起自己最英勇的作用、而且將影響中國其他軍隊、來更堅決地爲着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而戰鬥、這樣應來爲蘇維埃紅軍而犧牲的烈士有知、亦當含笑地下吧！

懷疑的人們、還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是不是其本質也改變了呢？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

我們應當回答道：過去紅軍是從土地革命中產生鞏固與發展起來的。過去紅軍是被迫在內戰中過生活、紅軍雖然一心希望打日本、但爲國民革命軍所迫、不得不進行自衛的戰爭。現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任務一旦實現、那麼紅軍的作戰對向已經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軍隊、而是日本軍及日本所指揮的漢奸軍隊。紅軍爲便利與國民革命軍的聯合改名爲國民革命軍、這樣紅軍當然要受國民革命軍的同樣的補充與待遇、因爲作戰對象、物質補充等等的改變、所以紅軍的戰略指揮政治工作（特別是政治工作）等等的內容、就有極大的變更、紅軍將成爲與日本直接作戰最堅決勇敢的軍隊。至於紅軍的領導當然是應當照舊的、因爲紅軍的指揮員基本就是共產黨員、戰鬥員也大部分是共產黨員、除去共產黨領導就不能有紅軍、就不能有這次最堅強的抗日軍。爲要使紅軍在抗日戰爭中起其應有的偉大作用、那麼紅軍的固有領導與主要成份就是說紅軍的這種優良的本質、當然是不應改變、無法改變而且還應當努力加以發展廣大的。至於紅軍番號服裝的改變、那這只能使紅軍愈能便利地接近其他國民革命軍部隊愈能與他們建立親密的團結、并以堅決抗日的影響、模範的例子去鞏固他們、加強他們、使他們能成爲更堅強有力的紀律嚴明的抗日軍隊。

懷疑的人們還要提出來問：在特區（蘇區）內、實行普遍的民主制度、那末豪紳地主是否會重新起來恢復自己的統治呢？

我們回答道：這害怕什麼呢？如果我們共產黨一切組織宣傳工作做得好、那麼羣衆就會堅決擁護我們、又何怕地主豪紳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來搶政權、如果我們工作做得不好、而地主豪紳爭取了政權機關的位置、那麼我們就祇能責備自己。這正是說在實行普選的民主制度之下、我們同志應當更加努力工作、領導羣衆保護羣衆利益。得到羣衆擁護、這樣才能使我們能夠鞏固特區的抗日政府的領導權。至於特區裏面工農勞動民衆所已得的一切權利、那末、特區政府當然要用一切力量加以保障。特區農民所已得的土地、同樣的應當保持在農民的手中、這是特區廣大人民的要求、在實行徹底民主制度的條件下、當然是不應變更而且是無法變更的。

懷疑的人們更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共產黨不總是主張暴動的嗎？爲什麼現在放棄暴動的方針呢？

我們回答道：共產黨不是隨時隨地主張暴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爲武裝暴動是政治鬥爭的一種特殊形式、他需要有許多政治的條件。不管政治客觀條件、而隨時隨地主張暴動、這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勃蘭基的盲動主義。盲動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所反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把武裝暴動當作藝術來看的。現在中國的政治形勢僅僅要求中華民族的和平統一團結禦侮、而不是舉行反對南京政府的武裝暴動。（當然在日本及漢奸統治區域舉行抗日的暴動是必要的而且應當的）。所以在南京政府實行和平統一團結禦侮之時、共產黨決定停止推翻南京政府的武裝暴動的方針、這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有利于民族解放事業的。

懷疑的人們最後還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共產黨過去八九年來爲着土地革命而鬥爭、現在停止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不是放棄土地革命嗎？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我們應該明白的回答道：現在禦侮救亡的事業急於一切、因為如果日本滅亡了中國、吞佔了中國的整個土地、那麼什麼土地革命就根本無從談起。我們現在首先要保障中國土地為中國人所有。至於中國地主與農民關係的問題、如何解決、那麼在民主共和國給予人民以民主權利的條件之下、人民的公意是可以用很好的辦法與適當的鬥爭來解決這一問題的。在那時候各黨當然可以提出自己的解決土地問題的意見交人民公決實行。但是現在的主要問題、却不在於爭論土地問題、而是在於如何切實的實行團結禦侮、如果因為共產黨主張土地革命政策、而使國民黨不能與共產黨合作：那麼共產黨雖然相信土地革命是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最好方法、但為着聯合抗日的關係利益、當然可以而且必須停止沒收地主階級土地的政策、在實行這一決定之時、必須注意三點：第一、對於漢奸的土地財產——當然必須按照抗日救國的綱領來加以沒收。這是抗日鬥爭的一部份、也是改良農民生活的一個重要辦法。第二、共產黨在領導農民的鬥爭中、一方面必須注意地保護農民的利益、改善他們的生活、（減租減稅減利、取消苛捐雜稅等等）絕對不能壓制他們的鬥爭、堅決反對大革命時代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重犯。同時他一方面必須充分地估計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利益、而不應提出那些不適於農民及民族當前需要的要求。以免妨礙抗日統一戰綫的開展。必須使農民最積極的參加抗日鬥爭、同時得到適當的生活的改良。第三、已經實行了土地革命的地方、當然不能違犯農民羣衆的利益、來重新恢復舊的剝削制度、在這些地方、農民當然要保護自己所得的土地。

×

×

×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諸問題

總起來說中國共產黨二月十日的通電、是促成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成功的偉大的力量。如果國民黨能夠毅然決然採納全國民衆的要求及共產黨的建議加以實行、那麼共產黨是忠實的誠懇的執行自己所允諾的保證的。果能這樣、則國內兩個政權的對立、就可以取消、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就能在全國建立、對日抗戰的勝利、就有了把握、中華民族解放的事業就有了最可慶幸的前途了。

共產黨爲着中華民族的利益、盡其一切力量爲「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任務的澈底實現而奮鬥、爲統一全國的民主共和國的建立而奮鬥。共產黨爲民族爲國家爲人民爲工農的忠心、是可矢天日的。除親日派及其漢奸托洛斯基派等人外、任何有良心有血氣的中國人、讚了共產黨二月十日的通電、當無有不熱烈贊成、竭誠擁護並爲之努力奮鬥的。如果這一通電的建議、能爲國民黨所接受、那末國共合作可以見諸實現、大規模民族革命戰爭的發動、必不在遠、而我們在抗日戰場上求得中華民族獨立的光榮任務、亦將直接的放到我們身上。所以我們的每一同志應當更加倍的努力、來堅決奮勇地不屈不撓地實行、黨所給予我們的偉大的抗日救亡的歷史任務。

二月十四日

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意義及 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宣傳解 釋大綱

(一) 西安事變有兩種前途、一是國內戰爭、結果分裂中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諸問題

國、便利於日本之侵略與漢奸之賣國。一是國內和平、結果團結中國、便利於民族統一戰線之形成與對日抗戰之實現。

(二) 中央採取一貫的和平方針、避免了戰爭危險、基本建立了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

(三) 今後的任務是鞏固國內和平、實現對日抗戰。對此任務、我們須給予極大的努力。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即係執行此種新任務的具體方向。

(四) 我們要求國民黨實行下列各條：

(甲) 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

(乙) 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丙) 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材共同救國；

(丁) 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

(戊) 改善人民生活。

(五) 如果國民黨能夠保證實行上列各條、即是說國共黨放棄了他們過去的老政策、採取了上述的新政策、那末、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在全國形成了、對日抗戰就有了基礎了。

(六) 我們爲了團結全國一致抗日之目的、願意向國民黨及全國保證實行下列各條：

(甲) 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方針；

(乙) 蘇維埃政府改名爲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爲國民革命軍、受南京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之指導；

(丙) 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民主制度；

(丁) 停止沒收地主土地、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

共同綱領。

(七)上述各條是我們對國民黨一個大的原則上的讓步、其目的在於取消國內兩個政權的對立、便利於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一致的反對日本的侵略。這個讓步是必須的、因為沒有這個讓步、就不便於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就不便於迅速實現對日抗戰。這是中央前年十二月決議案與去年九月決議案的具體施行步驟之部分。

(八)蘇區中蘇維埃制度取消、施行普選的民主制度並不能放棄工人農民已經獲得的政治權利、而要繼續保障之。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並不能放棄工農主要成分與黨的政治上組織上的領導、而要繼續保障之。在全國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並不能恢復蘇區土地剝削制度、而要繼續保障土地在農民手中。且在全國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之共同綱領、必須沒收漢奸分子的土地。

(九)一九二七年黨的八七會議以來、一貫執行的蘇維埃政權與土地革命的路綫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那時以來國內國際環境要求我們執行也僅能執行這樣的路綫。一九三五年黨的八一宣言及十二月決議案以來、我們一貫執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路綫、與爲着徹底執行此路綫現在又提出取消蘇維埃制度與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確的、因為此時的國內國際環境要求我們執行也能夠執行這樣的路綫。

(十)總之中央的政策是從團結全國抗日救亡的歷史任務出發、從實現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出發、全黨同志都應徹底瞭解中央的政策、團結在中央政策的周圍、爲民族階級的利益

而鬥爭、爲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全部勝利而鬥爭。

二月十五日

關於黨中央給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電的 (問題與答覆)

黨中央二月十日給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電發表之後、我們接到同志們的許多問題。現在把我們所收到的問題分類開列於下

一、關於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的——(一)八七會議和六次大會黨所定的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政策是否正確？(二)一九二七年取消派會說國民黨的政策、不是賣國而是誤國、主張成立普選的國會。現在看起來取消派當時的主張是否正確？(三)我們黨內在紅軍長征中、曾有人提議「捲起蘇維埃的紅旗」。現在看來這個主張是否正確？(四)黨中央給三中全會的通電、與取消派一九二七年時的主張、及長征時某些同志取消蘇維埃的主張、有什麼不同？(五)中國革命前途如何？

二、關於目前黨的策略的——(一)取消武裝暴動是否誠意的？(二)停止沒收地主土地是否不要土地革命？(三)民主共和國成立之後、是否還要來一個蘇維埃革命、才能轉變到社會主義呢？(四)現在爲什麼不成立國防政府而要承認南京政府爲全國政權？(五)蘇維埃紅軍是抗日統一戰綫領導中心、現在把蘇維埃改爲特區政府、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抗日統一戰綫是否失去了領導中心？(六)把蘇維埃改爲特區政府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諸問題

、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停止沒收地主土地、是否即係投降？

三、關於具體工作的問題？——（一）蘇維埃改成爲特區、與國民黨統治的區域有什麼分別？（二）是否所有的蘇區都要改爲特區呢？（三）國民革命軍牌子臭了、爲什麼紅軍一定要改名國民革命軍？（四）紅軍受南京指揮、南京方面、是否可以派法西斯來做政訓員、或者把紅軍隨便調動？（五）我們答應的四項保證是否要在南京實現我們的四項要求後、才能實現？

下面我們也分三段來答覆。

第一類問題的答覆。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暫時失敗以來的十年應當分着兩個不相同的時期來看。————

第一個時期、是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到福建人民政府這個時期中、在國際環境方面、一切帝國主義者、都聯合一致向中國革命勢力進攻、在國內國民黨雖有軍閥混戰和內部鬥爭、但國民黨的各派一致反對革命、國民黨當時成爲中國一切反革命勢力的集團。九一八以後、國民黨下層羣衆中雖然抗日情緒很高、但他的領導機關還是執行賣國政策。

第二個時期是從福建人民政府到現在。這個時期中、我們的環境起了極大的變化。在國際方面、一方面社會主義在蘇聯得到了澈底的最後的勝利、另一方面法西斯蒂日益猖獗、在國內、一方面是蘇維埃紅軍的存在和發展、特別是幾萬里的長征、和共產黨的抗日統一戰線主張、證明紅軍不但是不可消滅的、而且是中國抗日力量中最堅決最有力的一支軍隊、另一方面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諸問題

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激進、和親日派漢奸賣國賊的橫行無忌、這種國際和國內的情勢、使中國各階級相互關係起了基本變動、使中國國民黨的上層也發生了大的分化逐漸形成了左派（抗日派）與右派（親日派）的尖銳對立、和中間派（蔣系）的搖擺。

在這兩個時期中、我們所處的環境是大不相同的。因此、我們用來實現中國民主革命的口號與策略、也不能一樣。我們改變口號與策略、是爲的更好的實現中國民主革命。

在第一個時期中、我們是應用什麼口號什麼策略呢？國民黨在叛變革命後、當時既然是一切反革命勢力的集團、既然國民黨在日本侵略東三省和熱河時、執行了投降賣國政策、那末我們是無從與他妥協的。要同當時的國民黨妥協、那就是投降、就是出賣革命。所以我們當時的策略與口號——實行沒收地主階級土地、暴動推翻國民黨政府、建立蘇維埃政府、是完全正確的。

托陳取消派當時的主張、是在與我們完全不同的政治估計上出發的、他們估計中國的革命性質、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是社會主義革命了。他們說、中國封建勢力已經是殘餘之殘餘、而革命形勢繼續低落。因此、他們主張用議會鬥爭的方法、來準備他的、「社會主義革命」。托陳取消派、這種牛頭不對馬嘴估計、得出了錯誤的結論。

托派說、當時國民黨的政策只是誤國政策、不是賣國政策、這是和緩人民反對國民黨賣國政策情緒的鬼話。托派當時主張成立普選的國會、那實際上是無禮投降、他們是要取消革命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但福建事變發生情形就不同了、福建事變說明中國人民抗日運動日益發展、國民黨中的分化日益利害起來、這個時候、我們有可能與國民黨中的抗日分子合作了。我們黨在福建事變以前、已經提出了聯合抗日的三個條件、但當時的錯誤、是在沒有認真的去進行抗日統一戰綫的工作、在王明同志的文章「新形勢與新政策」中、已經把這點指出來了。

我們的黨、認為在這新的形勢中、抗日統一戰綫是可能的、因為我們足夠的估計了當時的形勢、所以我們不避一切困難、堅決北上、並且發表八一宣言、提出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和建立民主共和國的主張、改正以前的關門主義錯誤、聯合國民黨左派、爭取中派孤立親日派、八一宣言以來、不到兩年時間、得到了很大的成績。

有人說、抗日統一戰綫的政策、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和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固然是可能的、但是不是必要的呢？

我們讓國際七次大會來答覆這個問題。在國際七次大會上、特米脫洛夫同志在報告中、說到「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之重要性」、他說：

「爲什麼列寧認為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有這樣重大的意義呢？因爲列寧有鑒於「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規律」。這種規律告訴我們、如果不吸引真正廣大勞動羣衆到革命先鋒隊方面來、就不能有奪取政權底勝利鬥爭、但是要吸引這些羣衆、僅僅是一種宣傳和鼓動是不夠的、宣傳與鼓動不能替代羣衆本身的政治經驗。「左派」通常的錯誤就是他們以爲；只有一種非政治的（或革命的）危機、共產黨的領導只要提出革命武

論 抗 日 民 族 統 一 戰 線 諸 問 題

裝起義的口號、廣大羣衆就會跟着他來。不是的、而且即使有政治危機、羣衆也不一定跟着來的……正是爲的幫助千百萬羣衆、根據本身經驗、來儘量迅速的領會；他們應當怎樣辦、在什麼地方尋找有決定意義的出路、什麼政黨值得他們信任——所以必須要有過渡的口號、以及特別的「過渡到或接近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否則「極廣大的羣衆、因爲中了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幻想及傳統的毒、甚至在革命形勢具備的時候、也不會動作起來、躊躇不決和誤入歧途、找不到走向革命的道路、結果就受到法西斯蒂劍子手的打擊」。

「在這種情形之下（在中國即是在工農羣衆還沒有準備妥當直接推翻地主資產階級專政而只能鎮壓漢奸賣國賊的情形之下一一定註）、如果只是因爲不能直接消滅資產階級的專政（讀作「地主資產階級專政」——一定註）、就不肯成立和擁護統一戰綫政府那就是不可容許的政治近視、而不是鄭重的革命政策」。因爲目前漢奸賣國賊的反革命勢力、企圖把中國變爲日本的殖民地、今天中國人民所不得不具體選擇的、不是工農專政或地主資產階級專政、而是抗日政府或賣國政府。

但有若干機會主義份子、看不清這個局面、對革命形勢估計不足、他們根本不信抗日統一戰綫能實現他們說「國防政府只有暴動才能建立起來」、他們根本不相信有可能與國民黨左派和中派講統一戰綫、他們說：「聯合張學良是不可能的、聯合蔣介石更是夢想」。他只看見紅軍部份縮小了、看不到紅軍的影響和威權的提高、不看見全中國轟轟烈烈的抗日救國運動、不看見中國成熟着的新的革命危機、於是他悲觀失望、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認爲「革命到了退潮」、要「捲起紅旗」、暫時退避一下。這不是機會主義是什麼？這與我們黨的主張有什麼相同呢？

由此看來、我們黨的主張、與托派主張的不同、與黨的機會主義份子主張的不同、就可以明白。

在一九二七年以後、托派主張投降、主張取消革命。我們黨主張繼續革命的事業。我們黨中央給國民黨三中全會中的主張、不是同意托派的反革命主張、而是在新的形勢之下提出的新的主張。

黨的某些機會主義份子「捲起紅旗」的主張、是在新的形勢下、對於革命危機的成熟的估計不足、而產生的逃跑主義取消主義。我們黨的主張、是看到革命的發展、站在積極推動全國革命浪潮的立腳點上的。

特米脫洛夫同志在共產國際七次大會的報告中、論到統一戰綫政府、說關於統一戰綫政府問題、有三種錯誤可以發生。第一種錯誤、由於不把統一戰綫政府問題與革命危機聯系起來、因此右傾機會主義者能濫曲解問題、以爲在任何「經常的」形勢之下都應當設法組織共產黨所擁護的抗日統一戰綫政府（這恰恰是中國托派的錯誤——定註）超左份子與之相反、以爲這種政府、只有用武裝暴動的方法、推翻資產階級政府以後、才能成立（這恰恰又與我們黨內的机会主義份子一樣——定註）。第二種錯誤、由於沒有把統一戰綫政府問題和無產階級統一戰綫底羣衆鬥爭運動之發展聯系起來、因此右傾機會主義者、便可以曲解、以爲成立統一戰綫政府是一種無原則的策略、以爲就是作議會的勾結、超左份子恰恰相反、却大叫大喊、說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與反革命底社會民主黨（請讀着「國民黨」——一定註）不能有任何聯盟」、實際上、他們把一切社會民主黨人都看着反革命份子。第三種錯誤、是關於統一戰綫政府的實際政策、右傾機會主義者、認爲這個政府應當「拘守資產階級民主的範圍」、超左份子、恰恰相反、他們實際上完全不肯企圖建立統一戰綫政府。

以上我們已經答覆了四個問題。

最後關於中國革命前途的問題、我們應當說、中國革命有着光明燦爛的前途。六次大會所指出第二個「革命高潮」、已經到來了、這一次革命高潮、以抗日的面目出現、目的同樣是爲要完成中國民主革命。我們有着很好的國際國內條件、來取得勝利這些條件、主要的是：

- 一、資本主義制度發生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 二、蘇聯的社會主義徹底勝利。
- 三、國際工人階級統一戰綫的發展。
- 四、人民陣線與和平陣線的發展。
- 五、中國共產黨威信的提高、和十年戰鬥經驗。
- 六、中國紅軍實力的存在與發展。
- 七、抗日統一戰綫的發展。

當然要想取得勝利、還須要我們極大的努力去爭取的。

特米脫洛夫同志說：「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在發展的國家中人民陣線政府可以成爲工農民主專政政府」。

就中國現在的情況來說。第一、蘇區改成普選制之後、那裏的政權、形式上雖有改變、本質上依然是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因爲這個政權仍舊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但他們以前實行蘇

維持制度的工農民主專政、有若干不同、即是這個政府之中、同有若干從前的地主資產階級和富農份子參加、因此必須保持和加強共產黨在這些特區政府中的領導、才能使這個特區政府堅固地拿在工農和資產階級的手裏。

第二在非蘇區裏、國防政府是到民主共和國的臨時過渡政府、將來成立的民主共和國的普選政府在一開始的時候、可以成爲一種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抗日的資產階級以及抗日地主買辦份子的聯合政府、實現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只有經過艱苦的鬥爭、主要的是經過工農在抗日鬥爭中的模範作用和英勇、他的善於團結抗日力量、而及時的給叛變的份子以打擊、才能逐漸把普選的政府、變爲工農小資產階級以及有一部份進步的資產階級份子參加的政府、直到實現工農民主專政和澈底的民主綱領。這是一個相當長期的鬥爭過程、是要經過許多彎曲的。我們必須學會如何來在每一步的變動上爭取勝利、只有這樣、我們才不再會重復一九二七年時候的挫折、而一直領導着這個政府完成民主革命走向社會主的建設。

第二類問題的答覆

我們現在是爲民主共和國而鬥爭、上面已經說明了、我們今天要想達到民主共和國的目的所採取的手段、是抗日統一戰綫、而不是武裝暴動。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們會與國民黨聯合、因爲那時國民黨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是革命的、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叛變革命、這時候我們與國民黨毫無妥協之可能。那時講什麼統一戰綫、講什麼普選國會、就是背叛革命。那時僅有暴動推翻國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民黨的政策、才是革命的。但到了今天、國民黨中的左派主張抗日和反對親日派、中派有可能與抗日力量聯合起來、因此、在這個情形之下就應該採用統一戰綫。在今天這個形勢之下、我們無疑的應當停止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政策、因為這種改變現在是必要的了、實際上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的政策、在紅軍西征時毛主席發表的談話中、已經正式宣佈廢止了的。我們的這種政策上的改變、不但不是停止反對國民黨中的漢奸賣國賊的鬥爭、相反的我們爲的是要使那些漢奸賣國賊孤立起來、以便更容易的打倒他們。

一九二七年後、我們黨決定在中國創造蘇維埃區域、使他成爲「中國人民解放的模範區域」、使蘇區與國民黨區域、鮮明的對立來起、但是同時蘇區的政策、應當顧及全國人民的要求、只有這樣、蘇區所實行的制度、才能成爲全國人民所屬望的制度。這一點、王明同志在「新形勢與新政策」中亦鄭重的指出來了。

在目前新的形勢之下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所迫切要求的、是統一、民主、抗日。我們把蘇區改爲特區、變成中華民國的一部份取消兩個政權的對立、這就順應統一的要求、我們在蘇區內改變蘇維埃制度爲普選制度這就順應了全國人民民主的要求、我們在蘇區執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這就順應了全國人民抗日的要求。由於我們在蘇區中進行普選制和抗日綱領、我們仍舊保存着這個區域在全國的模範作用。

我們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是有下列原因的、第一、爲的是爭取不願當亡國奴的人們、到抗日方面來。這些人、今天還不願意甚至懼怕沒收地主土地的辦法、而僅僅贊成沒收漢

論 抗 日 民 族 統 一 戰 綫 諸 問 題

奸賣國賊土地財產的辦法。第二、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反革命後、我們會指出一切農民生活的改善、如二五減租之類、都在不可能、那種預測是完全正確的而且被許多事實所證明了的。既然如此、那末當時土地革命成了改善農民生活的唯一辦法。但在今天的情況之下、在全國抗日統一戰線日益發展的條件之下、採用具體的步驟、例如減租減稅等等、來改善農民的生活、和減輕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是可能的了。第三、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不是取消土地革命、土地革命的實現、可以採取種種辦法。以前的自下如上的用暴力的手段來奪取一切地主土地、不過是辦法中的一個罷了、以前只有用這樣辦法才能實現土地革命、但在今後情形又不同了。我們可以同時用從上如下、從下如上的辦法、經過一些具體步驟來實現土地革命。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沒收漢奸賣國賊土地財產和改善農民生活等條、就是實現土地革命的第一步。

我們現在的策略、是要改變南京政府成爲抗日政府用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代表會議、驅逐親日派的辦法、把南京政府、實際上變爲全國的國防政府、經過國會的選舉、憲法的制定、把這個國防政府成爲民主共和國的政府。民主共和國在最初的時候、以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做他的施政綱領、而在長時期的鬥爭之中、逐漸採取更加澈底的民主綱領、直到工農民主專政的綱領。

把南京政府改變成爲國防政府、在西安事變還沒有和平解決以前、是談不到的、那時我們僅能談到一般的國防政府。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南京政府中最大的實力派（中派）向抗

日方面動搖。因而在具體決定用什麼方法組織國防府中的時候、我們就有可能把南政府本身加以改變、而不去成立一個與南京對立的國防政府。

這樣說來、我們是否投降呢？顯然不是的。我們向國民黨作了原則上的讓步、這種讓步是必要的。是爲着給日本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因而也給整個的世界資本主義制度以打擊。

我們把蘇維埃變爲中華民國特區、把紅軍變爲國民革命軍的一部份、是否會失去他在抗日運動中的中心領導作用呢？非但不會失去這個作用、而且會加強這種作用。

我們爭取抗日運動的發展爭取資產階級民主權利絕對不會減弱羣衆爭取工農民主專政制度的熱忱、反而能夠更加提高他的熱忱和準備。列寧說：

「如果認爲爭取民主制的鬥爭、會轉移無產階級的視線、會使無產階級離開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或者會蒙蔽模糊他們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意識等等、那就根本錯誤了。恰恰相反，社會主義要是不實現完全的民主制、那他就不能得到自己的勝利。同樣的、如果無產階級不進行各方面的、澈底的革命的、爭取民主制的鬥爭、那他就不能準備妥當去戰勝資產階級」。

第三類問題的答覆

一、在特區內實行澈底的普選制度民主制、因此他與一般國民黨的區域、依然不同的。但特區中所實行的制度、今天後是民主共和國所應當實行的制度。與過去蘇區中實行的略有不同。例如關於土地問題、已經分配了土地的地方、當然不能再恢復土地的剝削制度、沒有實行分配土地的新區域、就不實行

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諸問題

分田、僅能限於沒收漢奸財產、和用減租等辦法改善農民生活了。

二、現有的蘇區、是都應當變爲特區的。

三、國民革命軍的牌子、一九二五——二七年曾經香過、因爲那時是國共合作時代。後來的確臭了、國民革命軍如果抗日牌子又可以香起來的、恢復他從前的光榮。傅作義的軍隊就是一個例子。現在問題倒不在國民革命軍牌子香臭、而在如何更加容易把他改變成爲抗日的軍隊。紅軍加入了西北抗日聯軍、西北抗日聯軍受到極大的影響。紅軍加入國民革命軍、就更容易影響和改造全國的軍隊。

四、現在紅軍加入國民革命軍、是實現全國抗日聯軍的一個具體步驟。紅軍與其他軍隊根本不同的所在、是他有共產黨的領導、他的主要成份是工農。這是不但不可放鬆、並且要永遠保持的特點。不但如此紅軍要成爲有力的抗日軍隊、還須要更加加強共產黨的領導。

紅軍加入國民革命軍之後、仍舊是共產黨的黨軍仍舊保持他的上述特點。如果紅軍正式加入國民革命軍、那時候在國民革命軍的軍事委員中紅軍應當派自己的代表去參加、這時候國民的命軍的軍事委員會、實際上已經成了抗日聯軍的軍事委員會。紅軍的宣佈改名和願意受南京軍委指揮、是有一個先決條件的就要南京國民黨實行抗日。要調動我們去做反革命的事情、或者陰謀消滅我們、那是不可能的夢想呵！

五、什麼時候完全實現我們的四項保證、要看具體情形來決定。例如停止推翻國民黨政府的一條、紅軍西征時毛主席的

論 抗 日 民 族 統 一 戰 綫 諸 問 題

談話中已經正式宣佈了。停止沒收地主土地、此次紅軍南下中已經實行了、蘇區改爲普選制、現在已在進行中。只有改名字和受南京指揮的一件事沒有辦到。這件事、需要一定的先決條件、即是南京政府真正成了抗日的政府、才能實行。

—完—

後 記

我們黨的致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通電發表之後、即是說我們黨爲着推進民族統一戰線、以民族國家的立場、對國民黨作原則上的讓步之後、在黨外黨內、都引起許多意見、本篇所集、即一部分爲答覆黨外人士的意見、一部分爲向黨內同志之解釋、我們覺得合成一編、便無甚麼不好、完全可以使得大家了解認識我們黨的爲民族獨立領土完整而努力之至高無上的真誠！

編者 三月十三日

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

(毛澤東與史沫特列談話)

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

美國作家史沫特列(SMEDLEY)女士於三月一日訪問蘇區。在延安會見毛澤東同志。關於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作如下之談話、誌其要點如下：

史問：共產黨現在執行的統一戰綫政策、與你去年秋季跟斯諾(SNOW)記者所談的、基本上有無改變？

毛答：如果從基本上說來、是沒有什麼改變的。這表現在下列各點：

(一)我們的統一戰綫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而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正向中國侵略。但是我們要求英、美、法、蘇等國同情中國的抗日運動、至少不反對；在這個基點上我們願意同這些國家建立友誼的關係。

(二)我們的統一戰綫是民族的。這就是說、包括全民族一切黨派及一切階級、只除開漢奸在外。有人說共產黨倡導人民陣綫、這是不對的。共產黨倡導的是民族陣綫、這種民族陣綫比起法國或西班牙的人民陣綫來、範圍廣大得多。

(三)因此、這個抗日的民族陣綫之主要政綱、應該包括下面各項：

- (1)國內的和平統一；
- (2)對日抗戰；
- (3)人民的民主自由；
- (4)南京政府轉變為真正的國防政府、容納各黨各派、罷免親日派；

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

- (5) 國家制度改變為基於普選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
- (6) 改善人民生活；
- (7) 發展工商業；
- (8) 聯合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

史問：爲了完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你們準備犧牲到什麼程度？

毛答：這要看看歷史情形、從一九二七年夏天開始、國民黨放棄了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綫、放棄了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與農工政策、放棄了民族獨立與民主自由的政綱、並且走向相反的方面、這就使得我們不能不單獨負起中國革命的責任、並執行蘇維埃政權與土地革命的政策、與國民黨處於對立地位。我們當時採取的這種同國民黨對立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與必要的。但當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共產黨就發表宣言：要求停止內戰、願在三個條件下與國民黨訂立國內和平對日抗戰的協定、可是那時僅有十九路軍同意我們的主張、南京方面則完全不同意、並且還舉行了大規模的圍剿、及至華北問題發生、國難已臨極端嚴重關頭、我們乃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進一步發表了組織抗日聯軍國防政府的宣言、同年十二月發佈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黨的決議案、並提出統一戰綫的具體綱領、這個新政策宣佈之後、立即得到廣大民衆的贊同、國民黨不少愛國份子也都贊同了這種政策、這是因爲更大敵人站在面前、只有停止國內戰爭、才能進行抗日禦侮、在中國政治上開闢了一個新階段。但是國民黨還不願放棄其老政策。到了去年八月、我們又寫給國民黨一封長信、堅決要求把敵對的目標、由國內移到日本侵略者身上、恢復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並提出改變

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

國家制度爲民主共和國、召集普選國會、要求他們痛悔既往、與民更始、我們聲明：蘇區願意實行與全國一樣的民主制度。

這封信獲得了國民黨中廣大的同情、然而國民黨中央並沒有回答我們。西安事變爆發、國家處於重大危險前面、其危險性就在日本必然地乘機進攻、其得和平解決實是如天之福。我們爲了鞏固國內和平、實現迅速抗日起見、當國民黨三中全會開會之前夜、乃於二月十日給了國民黨一個重要的電報。在電報裏表示了下列各點：

(1) 蘇維埃政府改爲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並受南京政府與軍事委員會的指導；

(2) 在特區政府境內施行澈底的民主制度；

(3) 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方針（此種方針、在去年我們就已實行、現在不過重說一遍）；

(4) 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這些新的表示、完全是爲了消除各界疑慮。取消對立狀態、以便同國民黨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在國民黨方面、則要求他們根本改變過去的政策實行對外抗戰、對內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等綱領。

史問：你們現在在這裏和在別的区域、將如何實行你們的統一戰綫的原則？例如對於商人、知識份子、地主、農民、工人、軍隊等方面的辦法。

毛答：對商人的關係、過去與現在沒有什麼差別、我們從來就主張發展民族工商業、紅軍所至、無不保護商人。最近在西安、三原一帶、紅軍不但保護商人、並且連地主的土地也沒有沒收一家、取得了各界的稱贊、這是人人皆知的事實。至於

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

蘇區裏面、商業是完全自由的。

對知識份子的關係、過去與現在也是一貫的保護政策、優待技術人員、文化人員與藝術家、對他們都採取尊重的態度。

對地主、只要他們不反對抗日救亡政策、就不沒收他們的土地。

工人方面、則斟酌情形、實行各種改良待遇的辦法。

對待國民黨軍隊的態度問題：任何中國軍隊尤其是有光榮歷史的黃埔軍都應在民族陣綫下親密團結、一致抗日、槍口向外、不生內戰。紅軍與國民黨軍隊雖打了十年、但我們絕不記舊恨、願和他們攜手偕行、並在統一指揮下、一致為保衛祖國而戰、我們相信、他們一定是和我們有同心的。上述這些政策、我們都願意同國民黨及各界人士商量、取得一致的意見、並把這些附在抗日方針、國家制度等等主要條款之後、一並放進民族陣綫的綱領裏面去、以便在全國範圍內實行。

史問：新的統一戰綫政策、是否即謂中國共產黨人為建立民族陣綫、放棄階級鬥爭、而變成了民族主義者？

毛答：如前所述、共產黨決定實行的各種具體政策、其目的完全在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衛中國、因此必須實現國內和平、取消兩個政權的對立狀態、否則對日抗戰是不可能的、這叫做將部分利益服從於全體利益、將階級利益服從於民族利益、國內任何政黨與個人、都應明此大義。共產黨人決不將自己觀點束縛於一階級與一時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熱情的關心全民族的利害、並且關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階級鬥爭問題上、我們主張從下述兩方面努力、適當的解決此問題。

第一、在地主資本家方面、他們是有錢有勢的、首先應當尊重民族利益、對於工農的生活及待遇極力加以改善。因為地

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

地主資本家如果照舊對工農施行各種慘無人道的壓迫與剝削、只顧他們一部分一階級的利益、工農就不能生存、更不能抗日、國家就要滅亡、地主資本家也要變成亡國奴。所以稍有良心的地主資本家、都應該激發愛國心爲了抗日救國的必要贊成改善工農的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決不能只讓自己有飯吃、工農就沒有飯吃；自己有政治上自由、工農就沒有自由、我想除非日本的走狗即漢奸份子、才不顧大局與民族利益、當此亡國滅種關頭、還向工農盡力的壓迫、剝削。這一方面的要求、我們已經代表全國工農向國民黨提出、國民黨爲了大局與民族利益、對此應該有滿意的答覆。

第二、在工農貧苦羣衆方面、他們是無錢無勢的、但他們是國家的基礎、是最大的階級。當此亡國滅種關頭、他們最重要的任務、同樣是抵抗日本、保衛中國、並且他們將是抗日救國的主要力量、抗日救國沒有他們是完全不行的。他們在得到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的改良之後、他們對於地主資本家與國民黨的不滿、也就可以減少。但工農同樣應該顧全大局與民族利益；因此、凡與抗日救國不適合的要求、我們同樣不主張提出。共產黨主張改善人民生活、而停止沒收土地、就是爲了這個原故。

中國共產黨現在提出的這些政策、沒有問題的是帶着愛國主義性質的。有人說；共產黨是國際主義者、他們是不顧民族利益的、他們不要保衛祖國、這是極糊塗的話。中國共產黨人是國際主義者、他們主張世界大同運動；但同時又是保衛祖國的愛國主義者。爲了保衛祖國、願意抵抗日本到最後一滴血、十五年來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鬥爭、是人入皆知的事實。這種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並不衝突；因爲只有中國的獨立解放

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

、才有可能去參加世界的大同運動。

史問：如果中國民族陣綫政府建立起來、那末對日本的和平條件是什麼？中日兩國之間是否還應該進行談判？

毛答：如果日本願意和平的話、我們是不拒絕談判的、我們的和平條件是下列各項：

第一、日本取消對中國的侵略政策、即取消其所謂大陸政策、與廣田三原則、尊重中國的獨立、將兩國放在完全平等地位；

第二、交還東北四省及察哈爾北部、取消滿洲國、取消殷汝耕冀東政府；

第三、撤退華北駐屯軍；

第四、停止日本飛機在中國境內自由飛航；

第五、取消日本在中國各地的偵探組織、即所謂特務機關；

第六、禁止在中國境內的日本人對於中國人所施的橫暴無理態度；

第七、禁止走私。

祇有在日本同意談判這些條件的原則之下、才應該進行和平談判。一切犧牲中國領土主權的談判、我們都要反對的、但是你要知道、只有日本人民政府成立、才在這些條件上談判之可能、日本現在是軍閥政府、這種可能並不存在。

史問：對日作戰是否已成爲不可避免？

毛答：不可避免。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軍閥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會停止的、因此戰爭無可避免、德日協定之後、戰爭的威脅更加緊了一步。

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

史問：日本方面宣稱中國國共合作是妨礙遠東和平的、你如何答覆這種理論？

毛答：日本軍閥的所謂「遠東和平」、是說日本佔領中國、而中國則不要抵抗、讓其佔領同中國問題有關係的各國如英、美、法、蘇等也不要反對、這就是「不戰而亡入之國」、是日本軍閥需要的所謂「遠東和平」但是還有一種遠東和平那就是實行我在上面講過的方法、日本取消侵略政策交還東北四省、撤退駐屯軍等等：使得中國人民和平地生活、世界各國與中國和平地通商、這是另外的一種遠東和平。但只有這種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這是中國人所需要的、也是世界各和平國家所需要的也是日本人民所需要的。不需要這種和平的、僅只有日本軍閥及其侵略盟友德、意兩法西斯國家。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我們反對「遠東和平」、這就是說的前一種「和平」；我們又贊成遠東和平、這就是說的後一種和平。我們主張拿後一種和平去代替前一種「和平」。因為日本軍閥口中的所謂「和平」、只是戰爭的別名、只是使得中國人當奴隸的別名、只是使得世界各和平國家大家感受威脅的別名、而且只是給日本人民以極大損害的別名。這種「和平」、據我看來、是應該對他「妨礙」一下的。

史問：中日戰爭和世界和平之間是否有矛盾？能否找出調和的基點呢？

毛答：中日戰爭和世界和平之間當然是有矛盾的世界大多數的國家和人民都希望和平、但是日本軍閥則希望戰爭。這種矛盾、依照日本的方針是不能調和的。要解決這一矛盾只有一條道路就是一方面世界各和平國家與中國一同反對日本的侵略

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

政策、迫使日本軍閥服從世界公論；另一方面、如果戰爭不能避免的話、中國應該堅決抗戰、只有這些辦法、才是同世界和平相適應的。同世界調和的基點、也只能建立在制裁與抵抗侵略者的政策上面。

史問：九國公約、凱洛格白里安公約和國聯盟約等類和平公約、你以為能夠阻止日本向中國作戰嗎？在中日戰爭中、你以為這些條約將起何種作用？有何種意義？

毛答：這些條約、在今天看來、確表示着一種和平願望、因此、侵略國家就表示了他們的堅決反對。但這些條約、對於日本這樣的侵略國家、僅只是一種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國作戰是不可能。這些條約在中日戰爭中、決不會起多大作用、因此也就沒有多大的實際政治上的意義、要阻止日本向中國作戰、必須有一種新的條約、而這種條約應該包括以武力對付日本侵略暴行的具體事項在內如像締結太平洋集體安全條約之類、祇有這種條約才能真正阻止戰爭、戰爭起來時、也能夠迅速結束戰爭。

史問：在聯合戰綫政府成立之後、中國能夠立即對日作戰嗎？或者還須相當的準備時期？

毛答：這要看日本的情形、在日本進攻中國時、不管在什麼時候進攻、中國都應該立起抗戰、但我們並不主張向日本挑釁、我們的方針是自衛戰、因此、我們應該迅速的切實的從各方面作準備、使中國任何時候都能夠應付事變、我們並不反對準備、但反對所謂「長期準備」反對以準備之名、行妥協之實

史問：如果沒有國際幫助、中國人民現有的資源、財力、是否已足以發動一個勝利的抗日戰爭？中國能否支持戰爭的財政經濟負擔？

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

毛答：沒有友軍、中國也是必須抗戰的。而且以中國的資源與自然條件、是能夠支持長期作戰的。紅軍的十年作戰史、就是活的證據。但是我們正在找尋友軍、這是因為日本已有他的強盜同盟、中國決不能自處孤立。所以我們主張中、英、美、法、蘇五國建立太平洋聯合戰綫。這種聯合陣綫是援助中國的、同時也是各國互助的。因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國的大禍、也是世界的大禍、如像德國是世界的大禍一樣。何況這兩個侵略國現在已經聯合起來了。我以為中英美法蘇五國應該趕快聯合一致、否則有被敵入各個擊破之虞。

史問：在現狀下——即日、德、意同盟的狀況之下、這樣一個戰爭、對日本的經濟、財政、貿易等的影響將如何？日本能夠在這兩國的幫助下渡過這個戰爭嗎？

毛答：日本侵略中國、對於日本人民是完全沒有利益的。日本對中國戰爭的最後結果、將不是日本的勝利、而是日本財政、經濟以及政治的崩潰。這一點、不僅日本人民知道、就是日本資產階級中具有遠見的人們也是知道的、但日本軍閥、則無論如何也不知道。日本軍閥已經結合了一個世界的侵略同盟、希望得到德、意的幫助和策應。他們不但希望用這種方法去渡過向中國侵略的戰爭、而且正準備用這種方法取得全世界。他們所做的夢當然是很完滿的、但是據我看來、他們的結果將不是怎樣完滿的。中國人應該有戰勝日本的自信心。

史問：共產黨為什麼主張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大家如出意外、希望有所解釋。

毛答：並不在意外、實是在意中、大家沒有聯系過去共產

黨的政治主張罷了。自從日本侵略開始以來、我們就是願意停止內戰的、因為祇有國內和平、才能對日抗戰。四年前三個條件下與國民黨軍隊訂立抗日協定的宣言、前年的八一宣言、去年的致國民黨書等等、無不是表示我們誠懇的願意同國民黨建立新的聯合戰綫、西安事變中、國內一部分人極力挑撥內戰、內戰危險是很嚴重的。如果沒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張漢卿送蔣介石先生回京一舉、如果不依照蔣先生處置西安事變的善後辦法。則和平解決就不可能。兵連禍結、不知要弄到何種地步。必然給日本一個最好的侵略機會、中國也許因此亡國、至少也要受到極大損害、當西安事變中、日本軍閥方面、甯滬平津一部分中國人方面、都說西安事變是共產黨的陰謀。這種說法完全不合事實。西安事變是國民黨內部在抗日問題與國內改革問題上、因政見不同而發生的、完全是一件突發的事變、我們事前全不知道。事變之後、甯陝對立、於是又有人說：共產黨要把西安造成馬德里、這也完全不合事實。中國與西班牙的政治環境根本不同、在西班牙不能不是內戰、而在中國的今天唯一的是對外抗戰、國內則必須和平、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事實、已經證明他們的話完全是臆測、有些則是惡意的造謠。

史問：許多人不但說西安事變是共產黨幹的、而且說在城牆上紅旗高懸、又說紅軍在三原一帶擄掠青年男女、究竟事實如何？

毛答：關於西安插紅旗一類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漢奸看見了罷、可是西安人至今沒有看見。擄掠青年男女的話、也必然是出之於日本人和漢奸之口。這也只有去問三原的青年男

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

女才會明白。現在官方文件中、還在說紅軍殺人放火、壓迫民衆、破壞農村。這些話他們已經說了十年了、可是至今還不疲倦、還要說一遍。說話的人固然有他說話的自由、可是全中國人也都有眼睛看事實的自由。現在政府還沒有製出禁止人民用眼睛看事實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跑到紅軍走過或往過的地方去看看實在情形、用不着我來多說。

史問：外面傳說共產黨現行的政策、是向國民黨屈服、投降和悔過、於此、你有何意見？

毛答：我知道外面正有人這樣說。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却不願意這樣說、日本人只願意國共相打、決不贊成這種「屈服投降悔過」的政策、因爲日本軍閥深知共產黨採取與國民黨協調的政策、儘管有人說它是「屈服、投降、悔過」、可是實際是給與日本侵略政策以嚴重打擊的。觀察中國問題有一個標準、就是凡屬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反對；凡屬反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歡迎。要檢查任何一政策一行動之是否正確、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態度就得了。現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的反對所謂「屈服、投降、與悔過」的政策、就可以證明我們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共產黨向國民黨要求的、是請他們結束十年來的老政策、轉變到新的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政策。這些要求、表現在共產黨給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電報中、那就是關於召集救國代表大會、人民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迅速準備抗戰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願意改變蘇維埃與紅軍的名義、取消同國民黨的對立、停止沒收地主土地。沒有疑義的、共產黨的這種步驟、是對國民黨一個大的讓步

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

。但這種讓步是必要的、因為這種讓步是建立在一個更大更重要的原則上面、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與緊急性。這叫做雙方讓步、互相團結、一致抗日、國民黨中所有明智的領袖與黨員、都是明白這種意義的。但國內有一部份帶着阿Q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的把我們的這種讓步叫做「屈服投降或悔過」¹。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魯迅。在他的一篇小說上、描寫了一個叫做阿Q的人、這個阿Q、在任何時候他都是勝利的、別人則都是失敗的。讓他們去說吧、橫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這類人物的。此外還有一部份患着「左傾幼稚病」²的人士、這種人各地都有、槍殺王以哲的那位孫銘九、就是這類人物的極端的代表。他們愛國出於熱忱、他們為喪權失地的悲慘歷史而憤激、他們的心地是純潔的。但是他們缺乏政治經驗、在大事變中認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與全體、過去與現在、今日與明日的差別與聯系。他們開始即反對蔣先生回京、後來又反對和平解決。在西安方面、有一部份人、不但對共產黨不了解、即對張楊及其他主持和平的人士也都不了解、他們不了解國民黨進步雖極緩慢、但一致抗日的前途是存在的。國民黨中、國民革命軍中的抗日情緒在日益增漲、大多數的領袖與黨員是能夠和我們及人民一道從事於抗日救亡的事業的。國民黨政策的轉變誠然至今還不滿人意、但是業已開始了他的轉變、三中全會的決議、可以看作這種開始轉變的證據。他們不知道把國民黨多數的愛國份子及可能走向愛國的份子、同實際賣國的份子即所謂親日派、區別開來、他們把這二者混而為一。他們又不知道國內一切先進份子的責任、在於多方說服暫時還不能了解我們觀點的

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

人使之得到瞭解、以便共同赴敵、這其間需要忍耐性、有時需要退讓一步、只要不違反抗日救國的大原則可以商量、關於這部份性急的志士們、對於我們政策的不了解、我們唯有以上述的自我批評奉獻他們、至於有些唯求個人與部份利益而把民族利益置之腦後的人們、不管他們是親日派或是口頭抗日家、那就不是什麼自我批評、也不是僅僅諷刺幾句的問題、而是揭破他們的陰謀、使之無法施展其伎倆。

史問：你們對於三民主義的態度如何？

毛答：我們老早就是信仰三民主義的、不然我們爲什麼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能夠加入國民黨呢？我們黨中曾經有若干人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及省黨部委員、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謝覺哉、董惟健諸位都是。又有許多人曾經是國民革命軍的領導幹部、我們的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林彪、葉劍英、徐向前諸位都是、現在的任務是必須爲真正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而奮鬥。這就是說以對外抗戰求得中國獨立解放的民族主義、對內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選國會制、民主共和國的民權主義、與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數人民痛苦的民生主義、這樣的三民主義與我們的現時政綱、並無不合、我們正在向國民黨要求這些東西。去年八月致國民黨書中、已要求他們恢復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我們是最堅決最忠誠地爲實現三民主義中國而奮鬥的。即以我們過去實行土地革命政策而論、亦無非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而已。至於我們還信仰共產主義、那是不相沖突的、孫中山先生在世時曾經同意我們、同時信仰共產主義、

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

並且國民黨員中有許多是信仰資本主義的、有許多還信仰無政府主義、有些人則信仰孔子主義、佛法主義、基督主義、無所不有、也無所不包。祇要當前革命政綱取得一致、即構成了團結救國的基礎、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國難的軌道。中華民國光明燦爛的前途、實基於此。 (完)